

李亦園與臺灣早期人類學： 時代和學術的激盪與對話*

劉斐玟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李亦園 (1931-2017) 是臺灣培養出來的第一代人類學家，身兼學者、學術行政領導、教學和公共知識份子等多重角色，他的人類學視野，因之牽動著臺灣人類學的發展。本文即是以李亦園的人類學生涯做為觀看視點，以之照見臺灣早期的人類學脈動，特別是1950~1980的臺灣人類學。人類學向以「土著觀點」、「當地知識」或「主位立場」為主要訴求，故而本文亦嘗試建構李亦園自身的「主位觀點」，並以此觀照他豐富多元的人類學生涯。

本文將以李亦園的三類著述為主要素材：(1) 學術論著、隨筆、口述史和媒體訪談；(2) 未公開發表的《大事記》；(3) 李亦園對其他人類學家的評述，特別是凌純聲和陳奇祿兩位人類學院士。其中，尤以第三類著述對於建構李亦園的主位觀點別具啟發。蓋「評述」映射的既是被評述對象之所作為，更是評述者的「視事觀點」；再者，由於李亦園和他所評述的對象分屬不同世代，他的視事觀點也因此標誌了學者與時代之間的「對話」——既是李亦園如何透過時代的眼睛，觀看他所評述的對象，也是李亦園對於他所身處之時代的回應與對話，這些評述因之呈現了李亦園的主位視點，同時亦是我們觀照李亦園之於臺灣人類學發展的探照燈。

在主位視點的探照下，本文析釐出李亦園的四種學術力：開創力、器識力、領導培力，和知識普及力；文末更指出探照燈之外的第五種學術力：尊師傳薪。這些學術力不僅標誌著李亦園個人的人類學生涯，更照見時代的思潮與契機，從而映照臺灣人類學早期的發展歷程。

關鍵詞：臺灣人類學家，李亦園，臺灣人類學發展史，民族學，主位觀點

李亦園一生有諸多頭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助教、教授，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創院院長，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執行長、董事長；除了學術身份，他也是報紙副刊作家，不時跟社會大眾分享他的研究點滴和文化評論。更特殊的是，早在1968年，他便以38歲青年才俊之姿，接任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一職，為中研院建立諸多新制（如：所長任期制）；1984年，更榮膺臺灣最高學術桂冠，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這許多不同職稱之中，對李亦園最具吸引力的，當屬人類學者，而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則是他的最愛。1998年，從中研院民族所退休時，李亦園應出版界之邀，將過往四十年的研究成果重新回顧，挑出18篇論著結集成《田野圖像》（1999a），並寫就〈我的人類學生涯〉作為「代序」，其中就提到：只要一到村落「心情頓覺十分舒暢」，連同行的學生都注意到他情緒的變化：「你們看，李老師到了田野眼睛都發亮了」（1999a：47）。李亦園自己也說：「田野工作固有困難甚至痛苦的一面，但是其……樂趣卻是外人所難以想像的」（同上引：46）。《李亦園自選集》中，他更以〈人類學的魅力〉開宗明義，為自己的生命情懷定調（2002a：38）。

的確，李亦園不論是治學、研究、教學、行政，乃至於扮演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為國家建言或在報章發表隨談，都發端於他身為一個人類學家的關懷。作為臺灣培養出來的第一代人類學者，又肩負如此多重角色，他的人類學視野，因之牽動著臺灣人類學的發展。本文即是以李亦園的人類學生涯，來照見臺灣早期的人類學脈動，特別是1950～1980年代的臺灣人類學（自1980中期起，李亦園即以學術行政為首務，而鮮少執行研究計畫）。人類學向以「土著觀點」（Malinowski 1922）、「當地知識」（Geertz 1983）或「主位立場」（Pike 1967; Harris 1976）為其學科訴求，故而本文亦嘗試建構李亦園自身的「主位觀點」，並以此照見李亦園豐富多采的人類學行止。

一、資料與視點

一般而言，建構主位觀點所不可或缺的素材就是個人著述，而學者的論著一般有三：(1) 學術論文、專著；(2) 對自身研究成果的定位，如自選集；(3) 由

學術研究衍生的隨筆雜談。第一類型的著作彰顯的是學者個人的研究旨趣、理論取向；相較而言，第二類著述凸顯的則是學者對於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宏觀視野和個人定位。當然，不論是研究旨趣或個人定位，所有的著述都有時代性，只是每一類著述所回應的時代或有不同；學術論述回應的是當時的學術理論乃至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¹而自選集則是在時間的縱軸上，既自我呈現，也指向時代變遷，甚至是學術典範的轉移；第三類的隨筆雜文所回應的，也是當代性，但不同於學術析辨，它是學者嘗試走出象牙塔，以淺顯易懂的文字與同一時代的普羅大眾談心。

除了上述三種文類外，另有些著述可謂「可遇而不可求」：一是口述史與媒體訪談，亦即學者對自身學術的敘說，但卻透過他人的書寫呈現；二是筆記資料，由學者自書、但通常是未出版的文稿；三是對其他學者的評述。幸運地是，李亦園三者兼備，從而提供更多不同的面向來幫助我們認識李亦園的學術情懷。

李亦園的口述史訪談中，最為完備的，當是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黃克武於2002到2004年間所執行的口述史訪談計畫《李亦園訪問記錄》（黃克武訪問2005）；2005年，民族所五十週年慶，當時民族所副所長張珣在時任所長黃應貴的指示下也訪問了李亦園（張珣訪問2005）。稍早，《思與言》創刊四十週年，也發表過創刊編委口述訪談，李亦園乃其一（潘光哲訪問2003）；除此之外，李亦園的報章訪問，也不勝枚舉。

自選集和口述史都具有時間縱度，只是自選集呈現的多是個人的「學術成果」，而口述史所陳述的更是當事人的「學術探索」以及不見載於學術論文的「背景文本」，包括學術議題的開發、學術行政的運籌帷幄等。不過，李亦園留下的資料中，更為難得的當屬他的《大事記》。1980年代，約莫李亦園自美國匹茲堡大學訪問九個月返台前，他萌生整理生平學術足跡的想法，他稱之為《大事記》。以紀年方式手書而成的《大事記》，載錄的不僅是他的學術活

1 舉例而言，民初中國知識份子在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威脅下，亟需找到「國族」賡續的解決之道，因而發展出別具中國特色的「邊政學」，造成「學術發展與國家救亡圖存……的密切結合」。1939年，教育部甚至將之列為大學必修課（黃樹民2011：180，182）。

動，還包括環繞在他身邊的人與事。例如：民族所同仁王崧興（1935-1995）盛年早逝，李亦園在《大事記》（n.d.：117），便留下他的追思與遺憾：「卅載同尋漢家源，待續前緣，詎料竟成永訣。一帆初渡龜山島，俯觀滄海，終遺宏願未伸」。其中的「卅載同尋漢家源」，描繪的正是臺灣人類學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1965年前後，在民族所所長凌純聲的指示下，李亦園和王崧興共同開啟了臺灣本土學者進行漢人社會田野研究的扉頁。

《大事記》固然是瞭解李亦園的重要材料，但「可遇而不可求」的第三類著述，即李亦園對其他學者的評述，對於建構「主位觀點」更別具啟發。如果「看到了什麼」，映射的不只是「所見」，更是觀者的「觀看視角」，那麼李亦園對其他學者的評述，投射的就是他對於「什麼是學者之核心價值」的定位，乃至於人類學家的「心之所向」。再者，由於李亦園和他所評述的對象，分屬不同世代，他的評述也因此標誌了學者與時代的「對話關係」，既是李亦園如何透過時代的眼睛，在觀看他所評述的對象，也是李亦園之於時代的回應與對話。

本文特別強調「對話關係」，在於任何的學術論述都有其時空背景；唯有將之置於時代脈絡之下，當可避免「以今非古」之失，乃至於忽略前人引領時代的機峰。舉例而言，英國人類學家Edward B. Tylor（1994 [1871]）以「文明」來檢視「文化」的社會進化論觀點，今人看來，必然會有「政治不正確」之嘆，但如果把Tylor放在十九世紀末的人類學論述觀之，那麼他對文化的定義實有他的「先見之明」。他不僅認為文化包羅萬象，涵蓋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等；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文化乃學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他的「學習觀」打開了日後功能論和環境適應論的分析視野。Tylor的例子說明了學者既是時代的產物，也可以是引領時代、創造時代的「應時之師」，這就是學者與時代的對話關係。

李亦園生前對不少文史前輩都有紀念撰文，如李濟（李亦園 1983a）、芮逸夫（李亦園 1978a），而其中和人類學密切相關者，當屬1959年當選中研院院士的凌純聲（李亦園 1970a、1975a、1998a）和1976年當選中研院院士的陳奇祿（李亦園 2003a）。本文即從李亦園對這兩位人類學院士的評述，析離出李亦園對於「人類學者當所作為」的「主位視點」，包括開創力、器識力、領

導培力，和知識普及力。沿著這四條學術力的論述軸線，在李亦園的學術論著、口述訪談、隨筆和《大事記》等素材的相互參酌下，²本文依之開演李亦園的人類學生涯和時代的對話關係，並以之映照臺灣人類學早期的發展歷程。

二、建構主位視點

（一）李亦園筆下的凌純聲院士

凌純聲（1900-1981）出生於江蘇武進縣，1923年自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畢業後，赴法國巴黎第四大學（梭邦）進修，1929年取得博士學位，乃中國最早的一批海外留學生。當時中央研究院甫成立一年，中研院第一任院長、素有「聖之通者」之稱的蔡元培，本身就是民族學家，更是第一個將「民族學」的概念引入中國的學者（何聯奎 1960），他深知民族學研究的契要，希望透過實地研究，增進國人對邊境各民族之認識與瞭解，故而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設立了民族學組，並身兼組主任。社科所成立之初，蔡元培即發聘邀請凌純聲學成返國後，加入社科所民族組。1933年社科所併入歷史語言研究所，凌純聲因而轉任史語所人類學組，1946年並兼任人類學組主任。³此後，亦曾出任中央大學邊政系教授兼系主任、國立邊疆文化教育館館長、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

中研院1949年遷台，1954年完成南港院址規劃。當時中研院的人文組在臺灣僅有史語所，院長朱家驊擬加以擴充，而首先考慮創建的就是近代史研究所和民族學研究所，一則是因為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於「民國以來的種種歷史轉變因素的認識頗有緊迫感」，希望能從歷史中得取教訓；一方面是既已播遷來

2 除了李亦園的論著外，筆者亦曾對相關人士進行正式與非正式訪談，包括早年曾與李亦園共事的工作人員、田野報導人，以及他的學生輩等，這些都是瞭解其時代脈絡的「背景文本」。

3 中研院社科所於1928年初立時，設有民族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法制學四組，1933年併入中研院史語所。翌年，該所轉而與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作，但民族學組則依然留在史語所，改稱人類學組。史語所1928年成立之初，已設有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組（第二年併入考古學組），1934年加入的社科所民族學組改稱人類學組，聘吳定良為主任。吳定良後籌組體質人類學研究所，1946年改聘凌純聲為主任（<https://www1.ihp.sinica.edu.tw/AboutIHP/Departments/anthropology>）。

台，「對臺灣本地的種種現象也應有所探究」，特別是臺灣當時為數近二十萬的「少數民族」（李亦園 1998a：743）。於是近史所與民族所便於1955年成立籌備處，由郭廷以和凌純聲分別出任籌備處主任。

凌純聲當時也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任教，是李亦園的業師，李亦園的第一個民族學田野調查，就是在1952年寒假，跟隨凌純聲和衛惠林，前往花蓮南勢鄉進行阿美族田野。凌純聲銜命領導中研院民族所時，李亦園為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助教，因「一心嚮往中研院的研究精神與傳統」，便隨業師轉任中研院（李亦園 1998b：1033）。

李亦園對凌純聲的學術評介主要有三：一是1970年為慶祝凌純聲七十華誕所寫的〈凌純聲先生對中國民族學之貢獻〉，二是1975年刊登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的〈凌純聲先生與中國民族學〉；三是1998年凌純聲逝世二十週年所寫的〈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紀念文。三篇文章的內容雖多有重複，但因成文的時間橫跨近30個年頭，從中，依然可見李亦園注入其中的不同觀點。舉例而言，1975年一文發表時，李亦園已出任民族所所長多年，行政經歷使他注意到「奠定民族所根基」的重要性（李亦園 1975a：18）。撰寫1998年一文時，適逢史語所七十週年慶，該文便著墨在凌純聲與史語所、民族所之因緣，以及凌純聲辭世前的內心感懷：「[我]學問的成熟是來台後才展開的」，但是在大陸期間，卻是「得益最多，最愉快的時期，因為那時候只負責出去做田野，一點都不必為經費與行政的事而煩惱」（李亦園 1998a：745）。

綜言之，李亦園對凌純聲的評述，著重以下三點：

1. 開創性：中研院1928年創立，翌年，凌純聲加入中研院社科所，並奉命前往東北松花江下游一帶，調查通古斯族系中的赫哲族，隨後出版《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純聲 1934）。李亦園（1970a：2）認為，凌純聲此行不但是中國第一次的「科學田野調查」，他所據以出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也是中國第一本「科學民族誌」，含蓋了歷史背景、物質文化、宗教習俗、傳說神話、語言等典型民族誌的內容。當時中國邊疆的民族調查，乃至戰後臺灣民族學界所撰寫的臺灣高山族調查報告，無不以此書為藍本。李亦園甚至以之比擬Bronislaw Malinowski在1922年所出版的劃時代民族誌*The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因為它們都是樹立典範的重量級之作。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之所以具有「科學性」，可從兩方面理解。其一，該書圖版佔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全書694頁，插圖高達332張）。「眼見為憑」的實徵精神，很能呈現「科學」所標榜的真實性。凌純聲擔任民族所籌備處主任／所長期間所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還保留了這一圖文並呈的民族誌風格。⁴其二，則和五四以後中國知識界追求科學與民俗學的脈絡有關。「科學」和「民俗學」看似截然對立，卻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回應晚清列強侵略的兩種調適機制：「科學」是追趕西方文明的目標，「民俗學」則是國族認同的根基所在；前者面向未來，後者根植於過去。凌純聲的民族誌所涵蓋的傳說神話、宗教習俗等，都是屬於「不科學」的民俗學範疇，但它又是科學的，因為它是根據實地考察和文物標本的蒐集而得。對李亦園而言，科學性的實地考察正是凌純聲的開創性所在。

的確，中國自古對異族向來是「鄙夷而忽視之」，即便有所記載，也多根據傳言，甚至「以訛傳訛，絕少有實地探訪蒐集資料」（李亦園 1970a：2），而凌純聲的民族誌卻是建構在歷時三個月「生活狀況與社會情形」的調查基礎上（凌純聲 1934：1）。從現在人類學少則一年、多則數年的田野功夫來看，三個月的時間或許稱不上紮實的田野，但如從中國史學以「典籍冊錄」為重的傳統來檢視，那麼凌純聲的田野精神，確有其時代意義（李亦園 1998a：737），堪稱是「中國學者在……村落中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的先聲」（李亦園 1970a：3）。

2. 器識寬博：凌純聲在大陸期間從事的是境內邊疆研究（包括東北、湘西）。中研院搬遷來台後，其研究也隨之擴展至環太平洋文化。具體而言，凌純聲希望透過文化特質和文化叢的研究（如文身、銅鼓、父子連名制等文化叢），說明臺灣土著族與中國古代閩越人的文化關係。這樣的研究固然有其缺點（黃應貴 1983），但李亦園卻從中看到凌純聲寬博的學術器識。「寬博」呈現在兩方面，一是比較的研究視野：比較古代中國與環太平洋地區的文化關係。凌純聲（1934）承襲蔡元培的看法，也是將民族誌（ethnography）和民族

4 吳燕和（2006）回憶道：凌純聲一直想替《集刊》找一個畫民族學標本和照相的助手；才高中畢業生的他，就是因為這一天分，進中研院民族所擔任技佐。

學 (ethnology) 做一區別，前者著重描述、記錄，後者涉及比較。凌純聲早期在大陸的赫哲族研究歸屬民族誌，在臺灣，則是推向民族學的比較視域。

「寬博」的另一呈現，是多學科視野的合流。凌純聲的赫哲族研究乃史料考證和實地考察的合流，⁵而環太平洋文化研究則是跨學科視野。李亦園（1970a：3-4）引用張光直（1969）的評述：「與題目有關的材料，不管是屬於考古學的、民族學的、歷史學的，或民俗學的，都要顧到……，不能斤斤較量個人或各科學問的『研究範圍』」；「有些意義晦澀的材料，正是因為放在一個題目下面，他所代表的內容，方能因而融會貫通。」李亦園認為，「寬廣架構的文化史觀」（1998a：741）和「廣遠開闊的胸懷」（1975a：17），是凌純聲對中國民族學最重要的貢獻。⁶

3. 領導與培育：李亦園（1975a：17-18）認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之研究得以立下不拔之基」，主要歸功於凌純聲在「研究計畫的釐定」及「後進的提攜」上。的確，中研院民族所在成立之初，就只是凌純聲帶領三個剛從台大畢業的年輕人（李亦園、李卉、任先民）加上一名工友（鄭格）一起打拼，當時無論經費或設備都非常艱困，甚至無固定預算。如何且戰且走，又能帶領同仁研究不輟，甚至建立起日後臺灣民族學研究的根基，就得仰賴凌純聲這個大家長的智慧和魄力。李亦園（1995：5）在民族所四十週年慶的演講中，提到當年經費上的困難：民族所成立那一年年底，大夥全員出動，前往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進行民族所第一次的田野工作。當時全所的經費只夠支應旅費和兩天的食宿雜費，但是凌純聲還是「老神在在」，原來他是「仙人自有妙計」，等到了屏東潮州鎮，才發了一封電報給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旅費不足請速匯款」，如此朱院長就不能不要會計室趕快匯一筆款項來了。

經費雖然拮据，但凌純聲對如何奠定民族所的基業，方向非常清楚：建立圖書館、設立文物典藏機制、出版《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甚至訓練大夥兒以「苦行僧」的精神從事學術研究。

5 何翠萍（1999：371）認為：凌純聲的赫哲族研究，更帶有「從周邊看中國文化」的理論企圖。

6 黃應貴（1983：118）頗有洞見的指出：臺灣人類學的開展和「凌純聲並不堅持其學派有關」：「他對於新的研究方向，還給予相當多的鼓勵與支持。這點雖然只是個人的風範，但因人類學界的人數很有限，個人（尤其是領導人）的態度，對各學界的影響力相對增加。這種容納『異己』的態度，增加了這學科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在圖書增設方面，他親自寫信給美國的Wenner-Gren Foundation，請對方提供出版訊息（圖1）。書籍的管理、編目、上架，則由研究人員親力親為（黃克武訪問 200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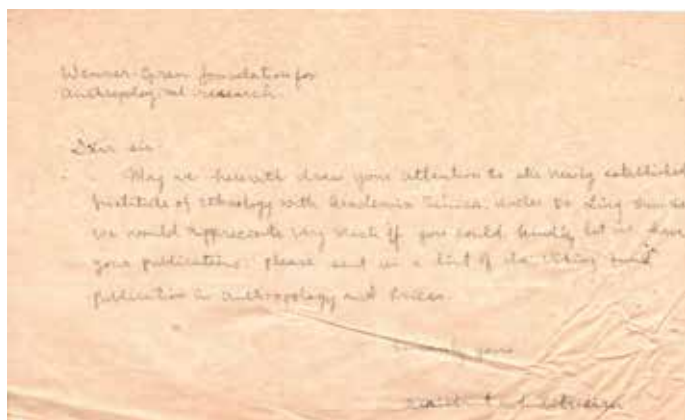


圖1 凌純聲發函Wenner-Gren Foundation的手稿（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典藏）

至於文物的典藏機制上，考量到那時各地原住民已逐漸和平地人接觸，如不搶救這些古舊文物，恐怕時不我予。所以，即便民族所的經費極為匱乏，凌純聲毅然於籌備處成立的第二年，設立「民族學標本陳列室」，並訂定民族所同仁田野蒐藏文物的倫理守則：只准幫所方購買，不得私自收藏（吳燕和 2006）；更且，為了充實館藏，他還激勵同仁，「省吃少用地把出差費省下來買標本」。民族所博物館所典藏的臺灣原住民文物約有百分之八十（約計3205件），就是在凌純聲擔任籌備處主任、民族所所長期間（1955-1970）入藏，打下了今日民族所博物館的基礎（李亦園 1995a：5）。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的出版是凌純聲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堅持和建樹。民族所1955年成立籌備處，1956年秋就出版第一期，更且，凌純聲「為了要達到半年刊的理想，刻意把出刊的時間印為四十五年（1956）春季，也就是說，從此以後，每期……（都）在趕進度！」（同上引：7），但也因此帶動了民族所的出版風氣。

至於提攜後進，最好的例子就是凌純聲所規劃的南澳泰雅族研究計畫；那是一個「集體訓練計畫」，計畫的目的，除了「調查研究」，更是為了「訓練

較年輕的田野工作者」（李亦園等 1963a：1）。當時參與的工作人員除了李亦園和石磊是民族所人員外，宋龍生、徐人仁、阮昌銳、吳燕和、楊福發等都是學生。民族所早期的研究多以「團隊」方式進行，主管的規劃與視野因之顯得格外重要，民族所當時能新人輩出，確是凌純聲的帶領之功。

（二）李亦園筆下的陳奇祿院士

陳奇祿（1923-2014）出生於台南，三歲時隨父母到中國居住，1943年赴日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一年後到中國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政治，副修經濟。1948年畢業後返回臺灣，擔綱《公論報》的國際版主編，後來又兼副刊〈臺灣風土〉主編。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研究幾乎銷聲匿跡，〈臺灣風土〉在陳奇祿的經營下，成為公開發表的園地，維持臺灣研究的香火長達七年（1948-1955，共195期）。期間，陳奇祿亦在台大歷史系擔任助教，同年（1949）八月，轉往甫成立的臺大人類學系擔任助教，負責標本的整理和相關課程並進行研究。

1951年，陳奇祿前往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研究，1953年返台後升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講師。1963年赴英國倫敦亞非學院留學，1966年獲日本東京大學博士。歷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執教長達50年。1972～1977期間，出任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文化研究所所長；1981年出任文建會（文化部前身）首任主任委員。

李亦園的〈陳奇祿院士的學術貢獻與書畫藝術〉（2003a），是陳奇祿院士八十榮壽之期，應邀推介《陳奇祿書畫集》（林金梅編 2003）而寫。文長不過3000字，卻道出陳奇祿的學術貢獻，特別是他的開創性以及知識普及之功。

1. 開創性：促成臺灣光復後第一次人類學田野調查。1949年7月，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尚未成立，當時板橋林家林氏學田剛好有一筆經費可資助研究，約舊台幣七千萬。還在台大歷史系擔任助教的陳奇祿，便鼓吹台大的老師李濟、董作賓、石璋如、芮逸夫、陳紹馨等，一起前往南投縣仁愛鄉瑞岩泰雅族部落做田野，由董作賓上山為泰雅族的時間觀念與曆法做調查、李濟為泰雅族人做體質測量等等。這趟田野行旅只有12天，但卻是一次成功的「集體田野」：79頁的報告，外加36個系譜表和24張圖版，不但成就了臺灣光復後的第一本田

野實地調查報告：《瑞岩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1950），更是日後國內從事民族學田野調查的範例（陳其南 1975）。李亦園認為，陳奇祿的「推動」之功不小，而這也和陳奇祿對田野的熱愛有關。陳奇祿的田野地之一是屏東縣霧台鄉的魯凱族，要爬山路十幾小時才能到達。「當時陳先生年紀尚輕，但也對走那一趟山路覺得很吃力。每次他下山回學校，都跟我們抱怨山路之難，說是實在不想再去了，但是第二天卻又一個人上去了，可見他對做田野工作的執著」（李亦園 2003a：12）。

2. 知識普及：主編〈臺灣風土〉副刊，推廣臺灣民俗知識。1948年，陳奇祿受臺灣文化界大老李萬居之託，主編《公論報》的副刊〈臺灣風土〉。〈臺灣風土〉是臺灣首次以民間風俗習慣、風土人情、史蹟勝景為主題的報紙副刊。更殊勝的是，「陳奇祿不但主持編務，而且自己寫文章，並親繪各種插圖，使副刊版面豐富而精美，一時引為風潮，吸引許多學者交相投稿」（同上引）。例如：畫家藍蔭鼎便在〈臺灣風土〉介紹臺灣土著和名蹟勝景；臺大社會系創系教授兼人類學者陳紹馨，則發表有關民俗兼及民族學的研究；臺灣的民俗專家林衡道介紹的是臺灣民間習俗和名勝古蹟；主治臺灣史的台大教授楊雲萍則以臺灣書誌或歷史人物（如劉銘傳）為主。陳奇祿在他的口述史《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寫 2004：45）中說：主編〈臺灣風土〉改變了他的一生，使他「走上了臺灣研究之路」；事實上，〈臺灣風土〉也引領了臺灣學研究，更重要的是，陳奇祿經營出一個知識普及的園地，讓學者可以將他們的研究所得，透過短文與大眾分享，同時，也讓民俗常識「知識化」，甚至建立屬於臺灣的知識系統。

李亦園對凌純聲和陳奇祿的撰文，雖說評述的是「他者」，但我們的眼界，所投射的既是所看到的他者，也是自己本心的映射與嚮往。易言之，李亦園所標舉的這兩位人類學院士的學術特質與貢獻，包括開創力、器識力、領導培力、知識普及力，實則亦反映了李亦園的「主位視點」：他對理想型人類學家的定位以及人類學在回應時代所應扮演的角色。下文即以這四種學術力作為觀照視點，從中照見李亦園的人類學生涯，乃至臺灣人類學的發展進程。

三、李亦園的學術力

李亦園，福建泉州人，1931年出生，父母都是教育世家。由於泉州僑鄉遠渡重洋的文化傳統，1948年，高中畢業的李亦園即搭船來臺報考大學，並順利進入臺大就讀。1949年泉州變色，臺灣因此成了李亦園落地生根的第二故鄉。

李亦園原先就讀臺大歷史系，大二時，學術歷程出現第一個轉機：李濟的「考古人類學導論」，啟發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大三時毅然降轉考古人類學系，因緣際會成了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也是臺灣本土培育出來的第一代人類學者。

1955年中研院成立民族所籌備處，李亦園隨著奉派擔任籌備處主任的業師凌純聲，來到民族所服務。當時臺灣的經濟甚是困窘，中研院的薪資也甚微薄，為了解困，李亦園在菲律賓教書的父親，曾幫他在僑居地安排了一個教書工作。1958年，正當李亦園準備「轉行」赴菲應聘教職之際，收到了來自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李亦園被拉回了學術界：他決定赴美深造（李康齡 1998）。

在哈佛大學師承人類學者Clyde M. Kluckhohn，是李亦園學術生命另一個轉折。Kluckhohn貫通人類學四大領域，也是哈佛大學提倡科際整合最力的學者之一，他和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人格心理學派的心理學家Gordon Allport、心理分析學家Henry Murray等，共同策劃了「社會關係學系」（Social Relations Department）。該系的成立，就當時美國的大學制度而言，可謂創舉。其目標是希望由社會學、人類學及心理學（包括社會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等行為科學，創造出代表科際整合的理論體系，而其背後的理念則在強調「各種科學表面上的差異只是同一形體的各面表現」（潘光哲訪問 2003：200）。李亦園在哈佛求學期間，正是社會關係學系鋒頭鼎盛之時；期間，他同時授業於文化與人格學派開創者之一的Cora DuBois、專研原始宗教的Evan Vogt，以及東方研究專家John Pelzel等。在哈佛問學雖只兩年，卻對李亦園日後的治學方向，有深遠影響（李亦園 1999a：18）。

1960年代前後的臺灣人類學，主要有兩大取徑：一是歷史學派，著重民族文化史的回溯與重建，而田野考察只是「禮失求諸野」、用以佐證史料的從屬工具（例如：芮逸夫）；二是傳播學派，亦即透過物質文化的蒐集、分析、比

較，來理解文化史及文化傳播的過程，李亦園的業師凌純聲，即是文化傳播論的代表。不論前者或後者，都偏向「描述性」的民族誌。⁷

經過西方思潮的刺激，李亦園自美返臺回到民族所的研究崗位後，重新面對臺灣當時的民族學、人類學，也目睹臺灣社會的快速變遷，李亦園開始思索什麼是人類學的本質？如何吸納西方理論之長，走出描述性民族誌的窠臼？人類學和當代社會又如何相互為用？在這三條思路的引導下，李亦園一步步走出他自己的學術足跡，展現他的開創力、器識力、領導培力，以及普及人類學知識的能耐和用心。

（一）開創力：探索文化變遷、開展海外田野、演繹具理論向度的民族誌

李亦園的開創力，主要呈現在兩方面：一是探索新的研究面向；另一，則是將西方理論納入民族誌的分析中，特別是文化與人格學派和功能論，從而跳脫以描述為導向的民族誌格局。

中研院民族所成立的初衷在於研究「即將迅速消失的高山族文化」（李亦園 1999a：14），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民族學者也以「搶救臺灣高山族固有文化」為己任（黃克武訪問 2005：71、141）——「高山族」是臺灣原住民在 1950 年代的習稱，後來改稱「土著族」，日領時期則稱「高砂族」，今日又稱「南島民族」。既是「搶救」，那麼訪問「長老」，再根據他們的記憶，來重建族人過去的文化，就成了當時主要的研究方法；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則是堅守英國皇家人類學會主編之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1951），包括凡事要請教三位以上的報導人，得到一致的答案，方可採信（劉斌雄 1995）。五十多年前擔任民族所南澳泰雅考察團隊的翻譯、現年七十多歲的泰雅人江新財回憶：「李亦園老師他們那時候做訪問是很嚴謹的，同一個問題要至少問三個人以上，他們才會確定下來。」⁸不過，對李亦園來說，這只是做田野的基本

7 歷史學派和傳播學派都以中央研究院為代表，又稱「南派」；相對而言，以燕京大學為首的功能論者，稱之為「北派」，他們多偏重社會實際問題的探討（如費孝通）。北派因多參與社會運動，且對政治多有批評，所以未隨國民政府來台；1950 年代的臺灣民族學和人類學界，多屬「南派」（唐美君 1976；岳南 2011）。

8 筆者 2018 年 4 月 9 日訪談。

態度，身為人類學者，有一個經常縈繞其心的關懷，那就是拼命追溯過去是否足已？

1962年，李亦園在他主編的《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中，對這個問題提出答案：一方面固然要「復原過去」，但探索「文化變遷」、「敘述目前的情況」，也是人類學家的職責所在（李亦園 1962a：4）。不過，這個答案的醞釀，並非肇始於1958年的馬太安阿美族調查（因該計畫方才展開，他即赴美深造），而是源自1960-1962的宜蘭南澳泰雅田野；這也是李亦園自哈佛返台後，民族所大家長凌純聲指派給他的第一個研究任務。

在這之前的泰雅研究，多以台中、南投一帶為主，而民族所的南澳研究團隊則將焦點轉向了臺灣東部。1960年，民族所在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下文簡稱「東亞學會」）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下文簡稱「哈燕社」）的贊助下，啟動了為期三年的南澳泰雅計畫，由李亦園擔任計畫總主持人，帶領石磊和臺大人類學系的五名學生一起進行田野考察。南澳的泰雅人在日領時期被迫遷村，從山野移居平地後，因生態環境改變，生活習俗隨之而易。李亦園的泰雅團隊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該當「繼續追問『長老』們有關過去的掌故，以便復原固有的文化」？抑或「應該注意目前的情況，並追尋其變遷的蹤跡」（李亦園 1963a：1）？隨著田野進行和研究團隊不斷地反思與討論，他們體認到：「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瞭解泰雅文化的整體，而不僅是為泰雅固有文化開出一張『雜貨單』」，那麼「固有」與「變遷」都應該是「齊下的雙管」（同上引）。

除了將研究議題由「固有文化」拓展到「當代變遷」，這支泰雅研究團隊也嘗試導入理論視野以突破描述性民族誌的窠臼。舉例而言，根據南澳泰雅田野所出版的《南澳的泰雅人》（上、下）（李亦園等著 1963、1964）的第四章，就是由李亦園指導學生吳燕和（1963）運用「文化與人格」學說，來呈現泰雅族的兒童教養方式。李亦園之所以鍾情於文化與人格學派，主要是受到哈佛大學文化與人格學派健將Dubois教授的影響。李亦園有一本田野筆記，甚至以“Child Rearing Manual”為題，記錄了田野考察的重點，包括兒童的技能訓練、語意訓練、認知訓練等（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典藏），顯見他對此一學派的熱衷。

在《南澳的泰雅人》中，和「兒童教養」相呼應的是「個人生命史」章節

（楊福發 1964），這一策略的運用當是受到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Kluckhohn的啟發。Kluckhohn（1946）著有“The Personal Document in Anthropological Science”一文，堪稱是推廣生命史取徑的人類學先驅。如果說文化與人格學派的關懷是找出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內化於每一文化成員而又一以貫之的文化核心稟性，那麼生命史則是將「不變」的稟性放在社會變遷的脈流中來觀照它的「變」，這種兼顧「變」與「不變」的民族誌手法，頗有巧思。

對李亦園個人而言，南澳泰雅的田野研究則是促使他完成兩篇重要論文：〈祖靈的庇蔭：南澳泰雅族人超自然信仰研究〉（1962b）和〈南澳泰雅族的神話傳說〉（1963b）。前者借用Melford Spiro和Roy G. D'anarade（1958）的功能論，說明儀式如何滿足並消除心理焦慮，包括Malinowski（1948）所謂為維持生存的基本焦慮，和Alfred Radcliffe-Brown（1939）所謂的維持團體整合與和諧的焦慮。至於〈南澳泰雅族的神話傳說〉一文，則是加入了哈佛大學業師Kluckhohn（1942、1951）對於儀式、神話和價值的分析概念，從而將研究視域從個人的心理焦慮和社會功能層面，拓展到傳說材料的運用，進而呈現文化的價值體系。這兩篇文章的學術意義，除了導入西方的理論思維外，更在於將臺灣早期以物質文化為基調的文化傳播論，開展到非物質面向的神靈、價值和宇宙觀層次。

嚴格說來，李亦園第一次將研究視角放在非物質性的神靈研究和心理人類學面向，是1960年所出版的〈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只是該文並不是根據李亦園的田野所得。1957年夏天，中研院民族所啟動為期三個月蘭嶼雅美族（現改稱達悟族）調查，並邀請三位雅美族人來民族所停留一個月。李亦園並未參與蘭嶼研究，但藉著三位雅美族人來民族所訪問期間，與之訪談，並據以撰就此文。這是李亦園自哈佛大學返台後，所寫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李亦園運用心理人類學和功能論的初試啼聲之作。該文以雅美族*anito*（惡靈）為例，闡釋社會學家Robert Merton（1938，1957）的功能論，包括正功能與反功能、顯功能和隱功能。在功能論的探照下，他呈現了「惡靈」的多重功能：雅美人可將無處發洩的仇恨感情投射在*anito*上，既免除個人的心理崩潰，也同時鞏固了社會的中心價值，免除社會解體的危機（李亦園 1960b）。

從1953年大學畢業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擔任助教起，短短不到十年，李亦園已累積不少臺灣原住民的研究經驗：邵族（1955年3月）、排灣族（1955年12月～1956年1月）、阿美族（1958年1月～6月）、泰雅族（1960年10月～1962年3月）等。經過這些異文化田野的刺激，他繼而思考：作為一位人類學研究者，「是否應該把研究的目標從異文化轉到自己的文化」（李亦園 1999a：23）。1962年七月，在結東南澳泰雅研究四個月後，李亦園決定邁向砂勞越進行華僑社會的研究——一個既帶有異文化（東南亞）又帶有本土性（華人）的田野考察。以東南亞華僑作為研究議題，也和李亦園的哈佛求學經歷有關。哈佛的Dubois（1944）教授曾在東南亞進行田野考察，她對東南亞華僑在當地社會所扮演的現代化角色抱持「負面的態度」，這對李亦園「衝擊很大」（潘光哲訪問 2003：75），因為李亦園家族中有不少華僑成員（其父在菲律賓教書數十載，堂姐則長年居住馬來亞）——他對「華僑」素有親切感。這兩種形象的衝突，激發了李亦園對東南亞僑社的好奇，因之成了臺灣第一位從事海外研究的人類學家。

當時臺灣要出國去菲律賓或新加坡都很困難，更何況是偏僻的砂勞越。李亦園的海外田野能順利成行，一方面得力於東亞學會的經費贊助，一方面則借力於Dubois的牽線。不過，李亦園在砂勞越的考察並不順利，主要是當地華僑多是福州人，對李亦園這位來自泉州的閩南人有所排斥，「不太願意回答比較深入的問題」（黃克武訪問 2005：147），再加上「自己不懂福州方言」（李亦園 1999a：25），幾經考慮，李亦園決定轉移陣地，改以馬來亞柔佛州（Johore）的蔴波（Muar）進行研究。當地的華僑使用的是李亦園熟悉的閩南語，再加上李亦園的堂姐在當地結婚定居，有此人脈打通關節，或可避免重蹈砂勞越的覆轍。

1963年李亦園前往馬來亞進行初步考察，原本打算1964年再前去進行長期研究。這種前期「探道」，再決定是否作為日後田野據點的做法，是凌純聲「搶救臺灣即將消失的高山族文化」的重要策略——凌純聲以江洋大盜的「踩盤子」（以方便日後做案）戲稱之（任先民 2012；吳燕和 2006）。不過，由於東亞學會在經費的提撥上出現狀況，李亦園原訂1964年「再訪」馬來亞的計畫並未成行。當時民族所的大家長凌純聲正思索如何將民族所的研究格局，從高

山族拓展至漢人社會，便指示李亦園先在臺灣的彰化伸港鄉泉州厝進行漢人村落的田野調查。李亦園（1999a：26）自己也認為：「假如能先有一段在臺灣農村的研究經驗，再去華僑社會工作，也許在理論上……更合適」。更何況，早在凌純聲指派任務之前，李亦園已萌生研究漢人社會的念想，而這，則和哈佛教授John Pelzel（裴約翰）的薰陶有關：「導師裴約翰先生……是漢文化研究專家」，受他影響，「我在學校時就已興起研究自己漢族文化的念頭」（同上引：23、18）。

1966年東亞學會再度提供經費，李亦園的馬來亞田野終得成行。南澳的泰雅研究讓李亦園開始關注文化變遷，而與「變遷」相伴隨的就是「適應」，受陳紹馨（1966）啟發，李亦園之東南亞研究的關懷點之一，就是把各地的華僑社會看做是中國文化在不同環境下的「試驗體」，以此瞭解他們如何因遷徙而產生文化的變遷與適應。例如：華僑處在母國文化與僑居文化的激盪中，如何形塑Ralph Linton及Irving Hallowell（1943）所謂的「本土化運動」（李亦園1966b）？在沒有自己政府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僑領和會館組織來團結內部以應付外來壓力？（李亦園1965a、1968）。李亦園根據前後10個月的馬來亞田野，出版了《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1970b）。

除了研究課題的拓展外，海外華僑田野對李亦園未來的人類學生涯，另有一層重要意義，即人類學方法論的反思。李亦園在這之前所研究的高山族或是臺灣漢人農村社會，都是小型社區，社區內的成員彼此都很熟識，但華僑社會屬於市鎮，乃較為複雜的生活形態，李亦園由之意識到人類學傳統的「參與觀察」或「自然觀察研究」（李亦園1978b），可能無法面面俱到。如何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或利用科際整合的視野，便開始在李亦園的心中醞釀。此外，從高山族到漢人，乃至海外研究的議題拓展，也讓他思考「區域研究」的意涵（李亦園1971b），⁹進而邁向「比較研究」的分析格局（李亦園1976），而科際整合的視野和比較研究，再加上「致中和」的文化模型，正是李亦園治學器識的展現所在。

9 二次大戰後，美國為對抗蘇俄為首的共產國家向全球擴張，便在學術上發展區域研究，亦即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為單位，綜合研究其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政治。中國研究在美國崛起，正是這股浪潮的產物。

（二）器識力：比較研究、致中和、科際綜合研究

1962年是李亦園研究生涯中，相當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他揮別了臺灣高山族的田野考察（往後，多帶領年輕學子執行田野計畫或接受研究委託），開始將研究目光轉向漢人文化，包括海外的華僑社會和臺灣農村。1962年，也是李亦園高山族研究展現成熟度的一年，他的〈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下文簡稱〈兩種結構系統〉），乃首度嘗試將研究格局從一地一族擴展至比較研究。文化傳播論也強調比較，但著重的是物質文化在形制上的比較。例如：陳奇祿（1951）就曾經根據東南亞盾牌的構造形制加以分類，並依其空間分布，推斷中國東部沿海與東南亞曾屬同一文化區；而臺灣原住民的長盾，其涵蓋範圍則包括了東南亞和新幾內亞。但李亦園的「比較」，關懷的不是文化特質的傳播所形塑的文化區或文化叢，而是帶有英國人類學家Radcliffe-Brown（1940、1958）之結構功能論的問題意識，亦即，文化作為一個有機體，其生命型態（physiology）如何運作？其社會形態（social morphology）上的異同又當如何分類？李亦園先後進行過邵族、泰雅，阿美、排灣等族群的田野考察。這些原住民的經濟生產都是山田燒墾輔以狩獵或漁撈，在物質技術方面，則有紡麻織布，但也都欠缺冶鐵技術；然而，在這些相似性上，又發展出各自獨特的社會組織（如：阿美族和卑南族都有年齡組織，泰雅族則無）。那麼當如何從「結構」上，來理解這些不同族群的差異呢？這些不同的社會結構又何以成為穩定社會的「系統」呢？

基於這一問題意識，李亦園針對馬太安阿美族和南澳泰雅族的田野材料，提出綜合性分析，撰就臺灣第一篇以「比較宗教」為觀點的論著。李亦園（1962c）的研究指出，阿美族的社會具有較嚴謹的「階梯系列」（hierarchy），且這樣的階級，不僅表現在年齡階級的社會機制上，也表現在宗教觀念與行為上。例如：他們的神話就充分表現出階層性。相對而言，泰雅族的社會結構，例如親族組織，就較為鬆懈，代替親族發生作用的是各種共同參加宗教儀式的團體 *gaga*。此一不具階級化色彩的社會形態，亦表現在泰雅的自然信仰中。南澳的泰雅人把所有的超自然存在都稱為 *rutux*，涵蓋生靈、鬼魂、神祇、祖靈等。雖說祖靈是泰雅族最主要的 *rutux*，要應時祭祀，但祭拜時是以集體之祖靈為對象，而不是個別的祖先。透過阿美族和泰雅族的對照，李

亦園以不同的「社會系統」來區分族群之別，並將視角轉向系統的聚合力如何呈現在各個元素之間的協同作用上。以阿美和泰雅的例子而言，就是社會組織和宗教信仰的聚合和相互為用。

對臺灣人類學界而言，〈兩種結構系統〉的意義，在於奠定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分類類型。二十年後，黃應貴（1984）就根據李亦園的架構，加以延伸，在阿美、泰雅之上，納入當時另外七個原住民族，並就政治、宗教、經濟、親屬四個層面進行綜合討論。他套用Marshall Sahlins在“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1963）中所提出的兩大社會型態，對臺灣原住民族加以分類：「首長（chief）制」，包括階級化較為嚴謹的排灣、魯凱、鄒族、阿美及卑南；「大人物（big-man）」社會，則涵蓋了相對平權的泰雅、布農及雅美族；而賽夏族則是介於兩者之間。值得一提的是，李亦園的〈兩種結構系統〉比Sahlins的文章還要早一年發表。

李亦園（1972c）對「泛文化比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雖然甚為推崇，但他在〈兩種結構系統〉（1962c）中所進行的「比較」，並非泛文化比較的異中求同並以之歸納文化通則，而是透過對照，抽離出貫穿社會運行的中心概念、骨架或體系，乃至文化的內在邏輯。他的比較研究因之投射出他的文化觀：文化作為一個系統，其內部的社會組織或社會結構並不單獨存在，而是和其他社會組織或結構相互呼應；以泰雅和阿美為例，他們呈現的就是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與基本宇宙觀三者的呼應關係。

功能性和結構性可說是李亦園早期觀照的面向，但呼應性和宇宙觀則始終是他的關懷所在，乃至後來發展出「致中和」的文化觀。

李亦園的「致中和」主要取擷自《禮記·中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與「和」乃宇宙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那麼文化做為一個小宇宙，其生生不息的關竅為何？在這一問題意識下，李亦園（1993b：9）提出「致中和」的文化觀，亦即宇宙或文化的賡續，奠基於三個核心系統的和諧：個體系

統（人的內在和諧與外在和諧）、自然系統（時間和空間的和諧）、人際關係／社會（人間的和諧、超自然界的和諧）。當然，這樣的文化架構並不是一開始就成形，而是逐步從〈兩種結構系統〉中所揭櫫的社會組織、宗教信仰、基本宇宙觀之共構關係（李亦園 1962c），日後再加上他在彰化泉州厝的漢人農村中，有關冥婚（Li 1968）、童乩（Li 1972）、風水（Li 1976）等小傳統的研究，使他對社會的和諧機制更加關注，終而在1988年的〈和諧與均衡——民間信仰中的宇宙詮釋與心靈慰藉模型〉中正式提出。2000年，在執行「氣文化計畫」時，又將「個人修練」的概念納入（李亦園 2000），使他的文化架構，同時涵蓋天（時間、超自然）、地（自然、空間）、人（個體的內在與外在），和其間的關係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超自然之關係）。

李亦園認為，「致中和宇宙觀」是「貫穿我長久學思歷程的主軸」，「是我一生從事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核心所在」，也是他最引以為傲的學術成就（黃克武訪問 2005：172，90）。不過，嚴格來說，「致中和」呈現的只是李亦園心中「理想型」的文化模型，而不是「解釋架構」。這樣的綜合架構有助於我們瞭解文化所涵蓋的層面：從具體的自然、環境、生計方式、社會組織，到抽象的時間觀、空間觀、價值觀、宇宙觀等；但「致中和」的架構並未說明應當如何切入這些面向，諸如分析手法等，更無法處理衝突、權力差等和邊緣性等社會現象。

相對於「致中和」，同樣是綜合性架構的「科際綜合研究」，可能是李亦園更為人知的倡議，特別是他和楊國樞所共同主持的《中國人的性格——科際整合性的討論》（下文簡稱《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的性格》（李亦園、楊國樞 1972）是根據1970年至1972年分兩階段所舉行的講演會論文結集而成。這一系列的講演會召集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醫學界、史學和哲學等不同學門的學者與會。當初籌辦的構想是希望「促成一種虛心接受客觀批評與建議的風氣」；同時，也藉以「促進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或科際合作的趨勢」（李亦園 1972a：i）。與會學者之一、專治中國思想史的章政通，在三、四十年後回憶過往：「當初參加『中國人性格研討會』對我影響非常大，因為從那時候我開始認識心理學、社會科學，我後來很多有關中國倫理的研究，都受了影響。我研究中國倫理是從心理學角度來寫的」（瞿海源等 2020：438）。

講演會以「中國人的性格」或「民族性」為題，其實也多少反映了「古之學者為己」的治學風範。蓋「民族性」這一議題——如Ruth Benedict的*Patterns of Culture* (1934) 和*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 ——在1930~1950年代二次大戰前後，雖說是重點學術，但到了1960年已是強弩之末，而李亦園仍以「中國人的性格」為題，實有其本土的時代意涵。所謂「時代」又涵蓋二層。一是中國知識份子自清末以來，面對列強侵擾下，如何在文化的反思中，找到民族定位？而《中國人的性格》要回應的，就是李亦園（1972a：i）在該書的〈序〉所言：「對自己能多所瞭解，才能在接觸別人的情境下認清自己，而不致於迷失方向」。另一，則是當時的威權政治。1966~1976年間，中國大陸瘋狂的推行以剷除傳統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相對於大陸的「剷除傳統」，臺灣當局提出了「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以為抗衡。在此一政治氛圍下，臺灣任何學術研究，如若對中國文化有所批評或質疑，不免被扣上「中共同路人」的大帽子。面對文化傳統的「政治化」，如何維持學術的獨立自主呢？以「中國人的性格」為題，無非是一種學術宣言：且讓我們以學術來探索什麼是「中國文化」，而不是將中國文化予以「意識形態化」！

《中國人的性格》對學術自主性的追求，直言無諱地批判傳統，招來了查封的命運。不過，「查封」有時反而「催化」銷售，導致盜版猖獗，港台都有。再者，學術自主的精神畢竟經得起時間考驗，2009年，該書被日本「東亞出版人會議」選為「東亞百冊經典」之一（《中央研究院週報》2009年11月12日，第1246期）。「經典」之所以「經典」，正因為它引領時代，開啟了臺灣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的新趨勢，而新趨勢的主要推手便是李亦園。

李亦園之所以走上科際綜合研究的道路，主要發端於1958~1960哈佛大學社會關係學系講求科際整合的薰陶（特別是當時的人類學系主任Kluckhohn之熱衷於社會學、心理學與人類學等行為科學的整合工作）；繼而1963~1967年間的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調查研究，則讓他體會到人類學的參與觀察，一旦進入規模較大的市鎮或複雜社會，恐有捉襟見肘之虞。李亦園因之開始思索如何借用其他學科之長，以補人類學之短，諸如社會學的問卷調查法和心理學的心理測驗方法等。但鮮為人知的是，除了這些學術因素外，還有另一層「難以對外人道也」的策略考量——而這，也是直到2002~2005年期間，李亦園在接受口述史專訪中，才加以披露。

1968年，李亦園以38歲青年才俊之姿接下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一職。總幹事的經歷對他一生的視事觀點有很深的影響，既讓他走出「單位主義」（張珣訪問 2005年），也讓他得以從「跨院所」的高度，進一步瞭解各所不同學科的學術特色（黃克武訪問 2005）。1970年，李亦園出任民族所所長後，更積極思索：「如何跟史語所有所分別」，建立民族所有別於史語所人類學組的學術利基——因為民族所是從史語所的人類學組分出來的。而李亦園所提出的學術發展策略，就是希望以「跨學科視野」作為民族所的「招牌」（同上引：140）。

李亦園在擔任民所所長期間（1970～1976），便以其行政力，將「跨學科」的視野落實在制度和人才的延攬上。就制度而言，就是分別設立以文化／社會人類學理論為主要取徑的「文化研究組」和以行為科學取徑為主的「行為研究組」（1986年再增設以海外研究為主的「區域研究組」）。在人才的延攬上，則同時進用人類學者、心理學者與社會學者。李亦園（1972c：7）在《二十年來我國行為科學的發展與展望》中，更以哈佛社會關係學系為圭臬，呼籲臺灣人類學走出傳統描述性民族誌的窠臼，轉而面向其他行為科學，特別是社會學和心理學——李亦園稱之為臺灣人類學界的「社會科學轉向」。不過，李亦園（1971a：11）也強調，「社會科學轉向」並非意味著「民族學研究所將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所；相反的，民族學研究所將保有其文化人類學學科的特色。問題只是哪些是文化人類學的特色？又如何保有它呢？這才是民族學研究所同仁所要繼續追求的。」

改革需要魄力，但也往往招致非議，李亦園把民族所導向「社會科學」中的「行為科學」又何嘗不然？！李亦園在民族所五十週年慶的訪談中，便有感而發：「當時很多人不原諒我，說不應該把人類學變成是社會科學」，但還好民族所的創所所長凌純聲「心裡實際上瞭解而且是支持的」（張珣訪問 2005）。或許，李亦園也不甚確定他所策動的「轉向」，對民族所的長期發展是利是弊，所以才嘗試從凌純聲的肯定中，得到一些慰藉！如若以當今的世界學術潮流來看，將民族所導向跨學科視域，和今日國際人類學界的發展若合符節（如：Ochs 2022）。但李亦園將跨學科等同於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又等同於行為科學的做法，今日看來頗有偏狹之虞；不過，在詮釋學、後現代、文學評論，乃至量子人類學尚未崛起的1970年代，李亦園有此想法也無可厚非。

（三）領導與培育：漢人社會研究、民間宗教研究

1965年，中研院民族所籌備處創建十年後，正式成立「民族學研究所」，這一年也是臺灣人類學發展的「轉折點」（黃樹民 1999：197）。在「轉折」之前，臺灣人類學的研究議題，多著重臺灣高山族，而研究取向則以描述性的民族誌為主，李亦園（1993a）稱之為「民族學誌」的時代。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在於當時臺灣的人類學者大多來自大陸，他們在「禮失求諸野」的訴求下，遠赴邊地採集文物並記錄文化慣習，以徵補史料。這樣的治學風格移轉到臺灣，就是搶救即將消失的臺灣高山族文化。為求「搶救」，他們所採取的研究策略，就非長時間、參與觀察式的田野蹲點，而是仰賴訪談一、兩位通曉部落慣習的耆老，以重建部落的文化傳統。這種強調「描述」、「記錄」與「耆老口述記憶」的研究方法，畢竟有很大侷限。誠如李亦園在接受口述史訪談時所指出：一則「難與世界其他各地的人類學者對話」，二則容易「忽略其他部落成員的認知」（黃克武訪問 2005：142）。面對這些挑戰，民族所必須有所突破才能開創新局：既能參與國際對話，又能兼顧本土研究；既能採集翔實的民族誌材料，又有建立理論範式的企圖與格局。這些都是身為學術領導人所應籌謀的大課題。從民族所籌備處起就執掌民族所的凌純聲，自然也意識到這個大挑戰，而他所籌謀開創的「新局」，就是「漢人社會研究」。他指派李亦園和王崧興，開始從事漢人社會的長期田野蹲點，一個研究漢人農村（彰化），一個研究漢人漁村（龜山島）。王崧興在《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的〈序〉中寫道（1967：ii）：

民國54年夏，作者本擬返國繼續做有關臺灣高山族的研究，但本所所長凌純聲師認為應另闢本所之新「戰場」，意即要作者展開漢人社會之研究。

在臺灣原住民的研究範疇之外，要拓展新的研究議題，有諸多選項，以「漢人社會」為題，其實有它的時代因緣。一方面，日本學者在日領時期已打下一些基礎；另方面，雖說人類學是以研究「異文化」起家，但1960年代的臺灣，要前往海外進行異文化的田野仍有諸多困難，除經費考量，還有政治顧

慮。舉例而言，李亦園的砂勞越田野得以成行，還是仰仗哈佛大學業師DuBois教授的牽線，才取得簽證（黃克武訪問 2005）。至於臺灣人類學界何以遲至1965年才啟動漢人社會研究，又和當時威權時代的政治氛圍有關。

人類學旨在揭示「當地知識」或「在地觀點」，而人類學家在貼近「在地」的同時，很容易與當地人涵化出同理心；如若研究的是漢人農村，不免滋生「同情農民」之心，稍有不慎，不免被冠上以農民革命起家之「共產黨同路人」的標籤，漢人社會因而成為研究「禁區」。再者，漢人社會的某些議題，有可能因抵觸當局的政治訴求而遭到壓抑，陳紹馨即是一例。在台大任教的陳紹馨乃臺灣人口研究的先驅，他以學術研究「洞見人口膨脹過速，終將是臺灣未來發展的大問題」；但此一討論人口節育的論述，與當時「生產報國，反攻大陸」的國家政策有所扞格，終不免有志難伸，抑鬱而終。直到二、三十年後，他的成就才受到世人肯定（黃應貴 1983：116）。王崧興（1991：2）就以「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來形容漢人研究在威權時代的學術困境。

漢人研究的「僵局」後來得以打開，主要是借助前來臺灣進行田野工作的海外人類學家。二次世界大戰後，Morton Fried和William Skinner兩人腳踏實地分別在安徽和四川進行調查，開創了漢人社會的人類學研究。但1950年代後半期，由於中國推動了反帝等一連串政治運動，國外的人類學家無法再進入中國進行田野，退而求其次，只好選擇香港、臺灣或海外華僑社會——所謂的「剩餘中國」（residual China, Freedman 1969: 8）——來進行考察。1950、60年代的臺灣，就湧入不少研究漢人社會的外國學者，陳紹馨和李亦園（1968）即整理了一份〈外國學者的臺灣社會文化研究〉名單，包括Bernard Gallin、Margery Wolf、Norma Diamond、Burton Pasternak、Myron Cohen等42位。陳紹馨並撰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1966：10），說明國外學者選擇臺灣做為中國研究的「代用品」或「實驗室」的學術現象，並探討「臺灣社會……能否代表中國？」這篇文章對李亦園頗有影響：他的臺灣漢人農村及東南亞華僑研究，就多少帶有「中國社會之實驗試管」的味道。

其實，李亦園和王崧興在1965年進入漢人社會的田野之前，陳紹馨已開始著手臺灣社會的研究，只是他並沒有真正從事田野考察。1964年，他和哥倫比亞大學來台大擔任客座Fried教授合作，進行「臺灣人口與姓氏分佈」大型

研究計畫（王崧興 1991）。1963年應邀來訪的Fried教授，可說是激發臺灣人類學界進入漢人研究的推手。Fried（1970）以臺灣宗親會來說明氏族（clan）的重要性，以此別於英國人類學者Maurice Freedman（1958）所描述中國東南沿海（福建、廣東）的世系群（lineage）。他們對中國親屬制度的不同解釋，「帶動了臺灣地區民族學與人類學……開始研究漢人社會」（尹建中 1996：388）。¹⁰受Freedman和Fried影響，臺灣早期漢人社會的人類學研究，多著重在家庭、宗族、婚姻、儀式行為等議題上（莊英章 1995）。

在這股漢人研究的潮流中，李亦園雖不是擘劃者，但卻扮演了播種耕耘的召集與培育之功：1968年，他組織了「漢人社會調查小組」（黃克武訪問 2005：145），並定期舉辦學術演講、讀書會。藉此，一方面凝聚研究人力，一方面也帶領一群年輕人，包括許嘉明、陳中民、徐正光、黃樹民、莊英章、陳祥水等，進行漢人社會的田野研究，前後到過高雄茄萣鄉岐漏漁村、雲林斗六與麥寮農村、屏東縣內埔鄉東片村等地考察。這群年輕人在1972年所推動的「濁大計畫」中，更得以茁壯成長；他們不但嘗試建構本土觀點，更開始參與國際對話，成為臺灣人類學界新一代的生力軍。

「濁大計劃」即臺灣濁水、大肚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的科際研究計畫，涵蓋地形、地質、植物、動物、民族學、考古學等領域，由中研院、臺灣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共同合作。這一五年計畫（1972-1976）的總召集人是耶魯大學的張光直，總計畫設在中研院民族所，由民族所的王崧興擔任執行秘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部分，則由當時的民族所所長李亦園主持，計畫重點在於探討濁大兩河流域漢人之拓展史、土著之遷移與漢化過程。參加的人類學者有謝繼昌、劉斌雄、莊英章、陳祥水、許嘉明、施振民、劉枝萬、陳茂泰、黃應貴等。

濁大計劃在漢學研究上有兩大成果。一是提出土著化的概念（陳其南 1980）。所謂「土著化」，是指漢人社群來到臺灣落地生根的過程中，為了因

10 臺灣學者遲遲沒有進入漢人社會的研究領域，可能還包括「文化自尊」的心理因素。第一個實地到台灣研究漢文化的美國人類學家Bernard Gallin，回憶1956年他以康乃爾大學博士生身份到台灣彰化鹿港從事土地改革後的社會變遷考察：「當時的人類學者對我所研究的問題有些偏見，認為我研究漢人文化，就好像中國人類學者研究高山族一樣，有看不起中國人的意味，因此沒有學者願意和我討論……。當時，只有陳紹馨先生給我許多幫忙和指導」（王嵩山 1981：146）。

應生存需要，所導致社會體制上的轉變。例如：在此一歷史過程中，為了要和臺灣原住民競爭領土主權，漢人社會逐漸由血緣關係的組構朝向地緣組構的聯結發展，因而形成了所謂的「祭祀圈」——而這，則是濁大計劃的第二個顯著成果。

最早提出「祭祀圈」的是日本學者岡田謙。岡田謙（1938，陳乃堯譯 1960）在士林的研究調查發現，不同祖籍的人會奉祀不同的主祭神，且其祭祀範圍和通婚、市場交易的範圍，有相互重疊的現象；他便以共同祭祀一主神的居民居住地，作為祭祀圈的定義。不過濁大計劃所提出來的祭祀圈模式（施振民 1973、許嘉明 1973），更在回應Skinner（1964、1965）根據地貌與市場階序所建構出來的區域觀。Skinner以行政體系與市場體系交錯疊合的空間視野進行分析，從而推論中國農民社會的基本單位不是村落，而是墟市。Skinner的學生Lawrence Crissman（1972）曾將Skinner的理論運用在彰化平原的二林，結果發現該市場體系並不能完全適用。受此啟發，濁大計劃便試圖從市場體系之外的角度——即「祭祀圈」——來檢視聚落的空間分布及發展模式（莊英章 1995、2005）。濁大計劃所建構的「祭祀圈」雖有不足之處，甚至有濫用之虞（王崧興 1991），但仍有其不可小覷的學術意涵：它使得臺灣的人類學走出「村落」的研究範疇，進而從「區域」的格局來檢視與思考相關議題；同時，也將史學的視野（文化發展過程）與研究方法（史料）帶入人類學（探索文化現況、田野考察）。而李亦園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學術領導與召集培力——召集並訓練出一批可派上田野實戰的漢人社會研究團隊。

民族所在1965年以後的研究重心，雖然由高山族轉向了漢人社會，但1972年啟動的濁大計劃在帶動漢人社會研究趨勢的同時，也讓高山族或原住民族的研究「在停滯一段時間期後，又得以重新開始」（黃應貴 1999：66），因為濁大計劃的主旨在於瞭解各個人群在這一地區不同生態環境下的適應，原住民族的生活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李亦園就指導了陳茂泰（1973）和黃應貴（與王崧興共同指導）（1973）等新生代人類學者，進行原住民族的研究。他們在前人所收集有關高山族文化的豐富資料上，進一步透過田野考察，來瞭解原住民族的社會變遷與適應。舉例而言，陳茂泰（1973）就以南投仁愛鄉的道澤和卡母界兩個泰雅族部落為例，探討經濟型態發生轉變時（由山田燒

墾轉變為果園經營），部落的固有傳統如何因應、轉化與調適（泰雅族的儀式團體 *gaga*，所轉換而來的教會組織，能否在外力的衝擊下發揮作用）。這一研究導向——探討原住民文化傳統所具有的「潛能動力」以及如何「變身」，以因應現代化、工業化和漢文化的衝擊——也成為日後許多原住民研究的標竿（黃應貴 1999）。1974年，李亦園更結合當時從事臺灣原住民研究的民族所同仁（如：劉斌雄、石磊、王崧興、瞿海源、陳其南）以及他所指導的學生（陳茂泰、黃應貴、許木柱與余光弘等），共同召開「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就高山族的語言、經濟變遷、基督教影響，以及山地政策進行討論，希望能為原住民族找出研究新機（李亦園等 1975）。

除了人才培育，李亦園的學術領導力還表現在研究議題的開展上，特別是民間宗教研究。李亦園對宗教一直有濃厚興趣，從北呂宋伊富高族的宗教結構研究（1960a），到雅美族的 *anito*（1960b）和泰雅族的 *gaga*（1962c）；他對東南亞現代化的闡析，也是將宗教帶入經濟發展的問題意識中，探討東南亞諸國的伊斯蘭教或佛教信仰，以其不鼓勵冒險競爭和追求物質享受之故，從而影響其現代化（李亦園 1965b）。

李亦園對宗教感興趣或許和他自小就「經常與祖母到廟裡拜拜」，也隨著母親「上教堂」的多元宗教經驗有關（黃克武訪問 2005：261）。不過，宗教研究成為李亦園終身的學術志業，當奠基於他在彰化伸港鄉泉州厝的漢人農村研究。在長達10個月的田野考察中，冥婚、收驚、風水、王爺出巡、道士作法、童乩過火、觀落音等特殊儀式，不僅埋下他「日後對於中國民間文化的興趣與研究」的種子（同上引：153），更重要的是，啟發他將宗教研究定位在「民間」和「實踐」的層次上。

對「民間」和「實踐」的關注，實際上也反映了李亦園對社會的敏感度。1963年，臺灣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生產（鄭美能 1974），經濟開始轉型。1964年9月，李亦園進入泉州厝這個人口約300戶的農村聚落進行田野考察。隨後，他進入馬來亞田野，開始關注現代化（1965b）、文化復振運動（1966b）。這些田野經驗的累積和社會觀察，促發李亦園思考社會變遷之於宗教的文化效應。在這一思考脈絡下，他分別從文化與人格、功能論和親屬角度，探討宗教實踐（如：冥婚、乩童治病、風水）如何體現中國人的社會性，

以及人與超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乃至這些實踐背後的文化價值、社會經濟情境，以及個人追求（李亦園 1972b）。

實踐往往隨時代更迭，李亦園的宗教研究亦然。1980年代起，他的研究視野開始從傳統民間信仰走向「動態的現象」（李亦園 1999b：310）。其中，包括探討臺灣經濟快速發展，致有餘裕追求心靈生活，從而隨之勃發的新興宗教（李亦園 1984；Li 1985）；1982年，李亦園甚至推動了現在依然炙手可熱的「媽祖進香」研究。李亦園在1983到1986年期間執行的「新竹市市民宗教行為之研究」，更是以民間信仰的轉型與蛻變為核心。該計畫不但檢視了不見載於官方記錄的民間寺廟，包括香火廟、土地廟、陰廟、佛寺、齋堂和私壇，更透過田野考察來呈現這些不同類型的寺廟，如何透過不同手法，以「仿效香火廟」為其發展的最終理想，以及其中所涉及的人聖轉化性和功利世俗性（李亦園 1999b）。計畫執行期間，李亦園已在清大任教，並不時帶領學生一起從事研究。在竹北進行考察時，就發生一件趣事：每次只要有神明巡境儀式，當時身兼清大人社學院院長的李亦園就帶著助手們騎著腳踏車跟在後面，有些人不免好奇：「為什麼會有一群大學生跟著？」「怎麼清華的人也來拜拜？」（黃克武訪問 2005：311）。

民間信仰是李亦園「終身的興趣所在」（同上引：90），而興趣背後反映的則是他對文化的理論訴求。對李亦園（1992）而言，民間信仰或民間宗教並不是自成一格的存在，而是照見「文化圖像」的聚光燈：它不僅能映照出文化的性格（民族性）和社會關係（如親屬組織），也投射出更高遠的宇宙觀；它不但提供個人和文化適應生活的機制，也是宣洩焦慮、化解失序的藥方；它既投射社會變遷的軌跡，又與時俱變地提供適應社會變遷的能量（新興宗教的崛起就是一例）。這樣的理論訴求，和其他著重宗教信仰、神學思想的研究，大相逕庭，彰顯出人類學有別於其他學科的研究角度。

如果說李亦園所召集訓練的「漢人社會調查小組」，要回應的是西方人類學者對於「中國何以中國Why China China」或是「什麼是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的提問，那麼他的「民間宗教研究」要回應的，則是漢學界的文化觀和知識份子的迷信論，並藉此為「文化中國」（1993b）的概念與內涵提出反思。易言之，在民間宗教的研究上，李亦園彰顯的不只是人類學家的訴求和視事觀

點，更嘗試和其他學科諸如史學、文學、中國思想史等學者進行對話。

以史學、文學、思想史為研究主流的漢學界，在論及中國文化時，總是以經史子集這些「大傳統」為主體，而民間「不登大雅之堂」的生活百態、習俗信仰等「小傳統」，一般不在他們的研究範疇之內，尋常百姓也往往被視為是「沒有文化」的一群人。李亦園便嘗試從人類學的觀點出發，呼籲學界：大傳統、小傳統都是「文化」；一般被知識份子視為「迷信」的宗教信仰活動，也是「文化」。既如此，我們就必須以嚴肅的學術態度來「理解」，而不是用我們的價值觀來「判斷」。李亦園在宗教研究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民間宗教納為學術研究的一環，並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帶入民間宗教的研究中，使宗教從「神學」或「信仰」的領域，擴展到「文化探索」的範疇。李亦園的〈臺灣民間宗教的現代趨勢——對彼得伯格教授東亞發展文化因素論的回應〉（1991）乃最好例證。1960年代起，全球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者莫不以西方文明為標竿，紛紛提供未開發國家步入現代化的「處方箋」，1980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崛起後，學者改以「新儒家」的價值觀來說明現代化的多元路徑，以駁斥「唯『西方』獨尊」的現代化偏見，Peter Berger（1988）便是此中代表。但是李亦園（1991）卻根據他對臺灣民間宗教的研究提出他的「李氏假設」；他認為「民間宗教」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是臺灣現代化的根基之一，並以此說明「小傳統」的民間信仰對現代化的貢獻絕不亞於「大傳統」的新儒家。李亦園的「李氏假設」雖然只停留在「假設」階段（缺乏田野素材以為驗證），但卻凸顯了人類學的學科價值，「補足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強調大環境（如韓戰、美援等）及政府政策」等看法上的不足之處（黃應貴 1998：301）。

李亦園能超越「迷信」的價值判斷與「大傳統」的包袱，並從學術的角度來檢視宗教，今日看來無甚稀奇，可是如果從宗教在中國歷史上的處境加以理解，那麼李亦園的宗教觀，確有引領潮流之功。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教活動長年不衰，但因歷朝歷代很多「事變」都是藉宗教之名以行之（如：漢朝的黃巾之亂，清朝的白蓮教起義），所以宗教活動向來是當政者的忌諱之一，甚至是當權者不可不戒慎待之的社會勢力。再加上五四以來，對「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推崇，從而使得宗教落入「迷信」的刻板印象。臺灣直到1988才出現第一個教育部承認的宗教教育研究機構（輔大宗教研究所），李

亦園居中倡言，功勞不小。李亦園對此頗引以為豪：「我個人算是國內較早真正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來看待宗教問題的研究者，擺脫以往從信仰或是政治的立場來看宗教」；「將宗教現象視為可觀察與研究的社會與文化現象，並認為應該在大學裡設立宗教學系或宗教研究所，是有我的貢獻之處」（黃克武訪問 2005：261）。

（四）知識普及力

學術之於社會的價值與定位，就在於「應時之師」：既要超然於社會之外，以便扮演「創造時代」（而非隨波逐流）的領航角色；也要走入人群，瞭解「時人」之所想與所惑，以便適時地傳道、授業與解惑。而李亦園最難得、也是臺灣人類學界至今無人能出其右之處，就在能將學術研究所得，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滲入民間。黃應貴（1983：120-121）回顧臺灣人類學的早期發展時，就特別指出李亦園在「人類學推廣工作上的成就」。

李亦園「推廣」的方式有二，一是授課演講，二是書寫。聆聽過李亦園授課演講的人，對他生動活潑、舉例闡釋的風格，頗能領略。原本就讀台大社會系的莊英章，就是因為聽了李亦園的課堂演講，決定報考台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李亦園老師來演講他在彰化伸港農村研究的田野報告，以臺灣農村家族變遷為主軸，從功能論的角度分析輪伙頭制度，也生動地描述冥婚、乩童等現象，讓我覺得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十分有趣」（莊英章 2017：55）。

李亦園的演講之所以廣受歡迎，不僅在於他的天分和努力，更在於他能將人類學所追求的「主位觀點」和語言人類學所訴求的「接受理論」活學活用。對李亦園而言，演講的第一秘訣就是「站在聽者的立場解釋事情」。因為「你懂的別人不一定懂，如能衡量聽者的立場而做演講，則容易為聽眾所接受」（黃克武訪問 2005：305-306）。秘訣二，就是要創造或尋找出和聽眾之間的「連結點」。比方說，2002年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重新開幕，他應邀演講，便以曾任史語所所長的李濟和董作賓為例，說明古物研究和古物收藏的分野對博物館的重要性：李濟教授生前家中只有一件商代銅鼎的複製品；著名甲骨學大師董作賓教授生前家中也沒有一片龜甲或牛骨的蹤跡（李亦園 2002b；黃克武訪問 2005：306）。

演講秘訣三，就是要善用「觀眾喜歡或易懂的例子與材料」，所以他平日就有「收集好例子的習慣」（黃克武訪問 2005：306）。最後，就是演講的心態：虛心準備。即便有些題目對李亦園而言，只要隨手拈來，便可侃侃而談，他依然做足準備。他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黃克武的口述史訪談時，依然秉持「資料找齊」的習慣，不但擬好大綱，而且「事先在腦子想過一遍」（同上引）。

這些演講技巧，李亦園也將之運用到教學中。李亦園最常被提及的一門課，就是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講授的「原始宗教」，這門課有很多外系學生旁聽，人數高達200人之多。瞿海源就是當時深受啟發的學生：「旁聽李先生原始宗教的課……激發了我研究宗教的興趣。後來宗教研究成了我終身研究的主題」（瞿海源 2017：59）。

演講授課的聽眾有限，但「寫作」所面對的大眾就無遠弗屆了。李亦園所書寫的學術通俗著作有很多不同型態：文集、單篇論文、散文、甚至小說。李亦園第一本帶有通俗意趣的作品，當屬1966年出版的《文化與行為》，這也是李亦園的第一本個人專著。該書是臺灣商務書局「人人文庫」的叢書之一。王雲五主辦的人人文庫，輕薄短小，定價也相對便宜，目的是希望經濟能力有限的讀書人也可以買得起。該書有可能是李亦園流通最廣的文集，很多非人類學系的大學科系甚至以該書作為指定教材。

《文化與行為》所收錄的論文大都發表在《思與言》雙月刊上。《思與言》堪稱臺灣社會科學發展史上的「奇葩」。1963年創刊的《思與言》乃私辦雜誌，由政治學者胡佛，召集一群中研院的年輕學人，包括李亦園等，一起開辦的社會科學刊物。其出版的目標有二：一是宣揚自由主義，「不讓政治干涉、不接受政治口號和宣傳文章」（潘光哲訪問 2003：76）；在戒嚴體制下，依然堅持學術自主，實屬難能可貴。二是提倡社會科學的整合，他們認為「不同的社會科學學科應該在研究方法上互相奧援」。在這些理想的驅使下，即便當時大家的薪水有限，編輯委員會的成員還是每人每月交50元新台幣（1963年臺灣每人平均國民所得為6999元）來支應出版所需（黃克武訪問 2005：107-109）。這一推廣學術的用心彰顯讀書人對知識的熱情與堅持。

《文化與行為》一書泰半是屬於心理人類學領域，列舉很多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在當時國際知識流通管道仍然有限的情況下，提供臺灣讀者一個認識外在世界的窗口。當時從台大社會系畢業、正在服兵役的徐正光，就是

讀了該書而決定轉攻人類學：「這本書篇幅不大，但文筆生動流暢，用了許多人類學田野調查的例子」，「[讓我] 開始對人類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徐正光 2017：61）。

《文化與行為》的出版還帶動了社會大眾對人類學的好奇與興趣，一些大學的歷史系、社會系和其他有關學系也因此開設了文化人類學這門課。對李亦園而言，這一現象固然可喜，但也是「壓力」，而壓力之源就在於「人類學界尚不能提供一本較現代化的文化人類學教科書」（李亦園 1974：3）。為了回應學界的「急需」，李亦園召集了二十多位臺灣人類學界的成員，包括重量級人物（陳奇祿、芮逸夫、宋文薰）、中堅份子（唐美君、石磊、劉斌雄）和後起之秀（吳燕和、黃樹民、尹建中、謝繼昌、莊英章、徐正光等），共同合作撰述，於1974年出版《文化人類學選讀》。該書出版不到一年即售罄。翌年，李亦園接續出版《人類學與現代社會》（1975b），將人類學從「異文化」和「理論思維」拉入「現代生活」的場景中。

人類學對「異文化」的探索，確實很能吸引大眾目光。李亦園1962年就前往砂勞越，是臺灣第一個從事海外田野的人類學者。很多友人基於好奇，不免私下探問東南亞的種種，李亦園於是仿效宋朝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寫了〈我怎樣做華僑社會的實地研究〉，刊登在《東方雜誌》的創刊號上（1967），不僅是「老文體，新書寫」的一個嘗試，也是對大眾宣揚人類學的研究手法。

至於民間宗教，它一直都是李亦園的心之所向，李亦園普及學術知識的努力自然也有「宗教」、「神話」的一片天地，如《信仰與文化》（1979）、《師徒、神話及其他》（1983）和《宗教與神話論集》（1998）。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說文化，談宗教：人類學的觀點》（2003b）乃是為了呼應國科會人文處推動的「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而作。當時的國科會人文處處長朱敬一（2003：7-8），希望人文素養能及早紮根，但又要避免「淺碟型介紹」或「片段專業知識的狹窄探討」，便邀請講員依個人專業，在寬廣的知識基礎上選擇一兩個方向，進行深入解析，而李亦園所選擇的兩個重點就是「文化」與「宗教」。該書也是李亦園所出版的最後一本科普著述，堪稱是他對於「什麼是人類學觀點」的封關之作。

人文素養的紮根固然是推動學術普及的目標所在，但對身為人類學者的李亦園而言，另有其它訴求。《文化與修養》（1996a）出版後，李亦園在接受聯合報專訪時表示：如果沒有田野在地友人的分享和支持，研究不可能完成。所以出版也是在「回饋供給他寶貴資料的『報導人』」（陳懷曄 1996）。

李亦園共出版了15本專著，除《一個移植的市鎮》（1970b）和《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1982）是學術專著外，其餘都兼含學術與通俗。其中，有三部書對李亦園意義特別不凡。一是《文化的圖像》（1992）。李亦園（n.d.：118）註記此乃「六十歲自壽之禮物」。楊國樞更特地寫了評介，言簡意賅地道出李亦園文風的神髓：（1）以具體現象或經驗說明抽象概念，讀者易於理解；（2）提供學理根據，讀者易於信服；（3）見聞廣闊、資訊豐富，文章之知識性高；（4）行文平實、說理清明，文章之可讀性大；（5）筆端帶感情，讀者易受感染（同上引）。

在臺海兩岸學術密切交流的1990年代，李亦園也應上海文藝出版社之邀，將過去各式文章重新整理，出版《人類的視野》（1996b）。其中，特別收錄很多非關上層文藝範疇的「民間文化」，如童乩、神靈、鬼魅等，就是希望「中國文化研究的同仁也能注意到一般民眾的所思所欲」（同上引：2）。本書對李亦園另有一層意義：「此為第一次在故國出版專書，堪慰外祖與母親地下之靈」（n.d.：126）。

1999年在臺灣出版的《田野圖像》，則為李亦園帶來榮耀。該書同時獲得《聯合報》和《中央日報》之「1999十大好書」。在接受中央日報「閱讀版」的專訪時（蕭雪球 2000），他語重心長地表示，希望學院裡的教授們，能夠「寫些普及化……的書，讓大眾分享且學習這些研究的成果，以及那份在學術鑽研上所投注的執著與熱情」。的確，《田野圖像》鋪陳出人類學家如何從書齋走入田野，再從田野回到社會，乃至將他們所習得的文化知識回饋於政策。例如，李亦園1982年主持的「山地行政政策的評估」研究計畫，就邀集了民族所同仁石磊、瞿海源、蕭新煌、余光弘共同參與，費了半年的時間，大家分別在九個高山族群所居住的30個「山地鄉」進行研究（李亦園 1999a：34），目的在於瞭解山地社會文化的變遷及其適應問題。據此考察而寫成的《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李亦園等 1983），最終促成1996年「原住民委員會」的成立，把人類學田野知識的「應用性」發揮的淋漓盡致。

《田野圖像》是1998年李亦園退休時，應臺灣出版界之邀所結集的回顧性文集，頗有自選集的味道；2002年，他也應大陸出版社之邀，出版《李亦園自選集》。兩相比較，可以發現《田野圖像》以「知識普及」為主要訴求，故而理論論述濃厚但卻代表李亦園學術標竿的〈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1962c），並未收錄其中。相較之下，《李亦園自選集》則多了李亦園學術生涯中常被忽略的向度：受到美國人類學者Richard Bauman（1977、1990）的影響，他呼籲將民俗學和民間文學亦納為人類學的研究範疇。但不同於Bauman的是，李亦園的民俗學和民間文學仍停留在文獻研究的框架中，而不是將田野考察帶入其中，或許這是為什麼李亦園在這方面的研究較少受到人類學界矚目的緣故。

除了著書立說，李亦園也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隨感。刊載於聯合報副刊的〈感情的機緣〉堪稱此中經典（李亦園 1995b）。1964至1965年間，李亦園在彰化海邊的一個小村落泉州厝做漢人農村的田野研究。居停主人在當地很有名望，住家是一棟漂亮寬敞的古式大厝，主人不常在家，只有女主人帶著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女主人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太，對李亦園和他的助手陳中民都很好，常常送東西給他們吃。只是彼此之間太過客氣，總有些生疏，甚至有些「不太信任」，「因為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外來人」。直到某天晚上，事情終於有了轉機：

那個說來有點「三八」的丫頭受了責備，居然跑掉了。老太太急得不得了，於是我和我的助手拿了手電筒，陪老太太走遍了全村去找他。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海邊的風吹了刺骨，田埂又泥濘不好走，我們三個人扶持地走，老太太說算了。但我們堅持找下去，最後在村外的一家小土地廟裡發現那個小丫頭正睡在牆角落，大家才鬆了一口氣。自從那一夜之後，老太太的態度變了，待我們十分親切有如子女一樣……。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很微妙，有時需要一個特別的機緣才能有所突破……。

文章不滿一張稿紙（圖2），卻道出田野工作最迷人之處：情感與機緣。



圖2 李亦園手稿：〈感情的機緣〉（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典藏）

無論是引領學生進入人類學之門、向社會大眾宣揚人類學觀點、闡述田野的樂趣與啟發，或以出版回饋報導人的信任，李亦園可謂將知識普及的能量發揮到了極致。

四、結語：尊師傳薪與殷鑑

本文以開創、器識、領導培育，和知識普及等四種學術力，層層開演，以之照見李亦園身為人類學者的諸多作為。李亦園是臺灣訓練出來的第一批本土人類學家，並在哈佛大學進修接受西方理論洗禮；返台後，除了回到中研院民族所的研究崗位外，亦在台大開課執掌教鞭，並身兼學術行政主管等職務，又不時在期刊報章發表隨筆。他的多元求學經歷和多重角色扮演，不僅形塑他的人生類學生涯，亦投射了臺灣人類學早期的發展進程。

1950年代的臺灣人類學，基本上是由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民族學者所主導，在「禮失求諸野」的訴求下，臺灣人類學早期的治學取徑主要是史料徵補和文物採集，並透過耆老訪談來記錄、搶救並重建即將消失的高山族文化傳統；李亦園（1993a）稱之為「描述性」的「民族學誌」時代。1960年，李亦園自美返台，除了導入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特別是人格與心理學派、功能論），也嘗試民族學的比較研究，並提出「社會結構系統」的概念，以作為臺灣原住

民各族群的分類依據。在研究議題上，則由物質文化（文物採集與記錄）拓展至宇宙觀和神話傳說；從搶救和保存固有文化，擴展至文化的變遷與適應。到了1970年代，臺灣人類學界更嘗試將理論視域導向社會科學的科際整合，特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學所代表的行為科學。

1950、1960年代的臺灣，因緣於大陸政權的封閉，湧入不少以臺灣做為中國研究之「實驗室」的英美人類學者，在這些海外漢學家的刺激下，臺灣人類學開始由「搶救即將消失的高山族文化」，轉而探索原是威權時代研究禁區的漢人社會。他們探索漢人社會的方式和以往高山族研究有所不同：一是從團隊研究走向個人的獨立作業，二是從耆老訪談走向田野蹲點，三是積極參與國際漢學界的對話，並嘗試提出本土觀點（如：土著化和祭祀圈）。李亦園雖不是推動漢學研究的擘劃者，卻是漢人田野研究的先驅，更組織訓練出新一代的人類學研究者，適時加入漢人社會研究的田野實戰（濁大計劃），帶動臺灣漢學研究的蓬勃。

1950、1960年代的臺灣學術界，也需面對研究經費拮据的挑戰，東亞學會和哈燕社等海外經費的挹注，不但使得臺灣的高山族研究得以開展，更讓臺灣人類學界得以跨足海外，李亦園因之成為臺灣第一位從事海外田野的人類學者。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開放，中研院民族所在1986年甚至成立了以海外研究為主的行政編制（區域研究組）。在李亦園的倡議下，宗教從信仰（或迷信）走進學術殿堂，宗教研究也從大傳統走向民間小傳統，乃至蔚然成風。李亦園在學術普及的推廣上，更是無人能出其右；1970年代起臺灣就亟需一本人類學教材，唯半世紀來，此一困窘一直待解，直到2017年，民族所才訂定學術普及叢書的出版機制，並以《人類學家的我們、你們、他們》（余舜德、張珣、劉斐玟主編 2018），來呼應李亦園普及人類學知識的用心與熱情。

臺灣人類學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契因，有些是時代促成，如臺灣作為中國研究的「實驗室」；有些則仰仗個別人類學家的前瞻識見與才情，如凌純聲釐定民族所的發展方針。在時代與個人的相濡以沫下，共同推動臺灣人類學的發展。李亦園所展現的開創力、器識力、領導培育和知識普及之功，也是時代和個人識見的相互表述和相互建構。當然，這四種學術力之間的份際，並非截然可分。舉例而言，李亦園一般被認為是臺灣社會科學綜合研究的舵手，以此而

言，當屬「開創力」；但若顧及李亦園身為中研院民族所所長時，如何為民族所定位，以別於史語所的人類學組，那麼科際綜合視角彰顯的是李亦園的「領導力」，可是本文卻將之歸諸於「器識力」，因筆者深信，寬博的器識，乃開創性和行政領導的根基所在，正如唐朝裴行儉所言：「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舊唐書·列傳·卷140：5009》）。又如，李亦園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帶入宗教研究，並將民間宗教納入學術研究之中，在臺灣學術發展史上絕對是「開風氣之先」，但筆者卻將之歸諸於「領導力」，因為成就一人之功名容易，造就臺灣蔚然成風的宗教研究功業，更顯難能可貴。

本文以四種學術力來觀照李亦園，乃至臺灣早期的人類學發展，是從他如何闡述、定位凌純聲和陳奇祿兩位人類學院士的學術特質中析釐而出，筆者視之為李亦園的「主位視點」，因為我們觀看別人的「眼睛」，實乃我們內心世界對外的窗口，所以如何觀看他人，投射的既是「他人」，也是「自身」。但必須注意的是，在他人身上，只能投射「部分」的自身，而非「全部」，就如同李亦園之於凌純聲的評述上，並無法彰顯出李亦園的「知識普及力」，因為那並非凌純聲人類學生涯中所呈顯的特質；但這並不意味著凌純聲不具學術普及力。更嚴謹的說法是，學術力所彰顯的既是學者的稟性，更是學者與時代的對話性；換句話說，內在稟性是否外顯，端視它與時代的對話關係而定。所謂「英雄創造時代」、「時代創造英雄」，其揭櫫的莫不是英雄內在稟性在時代的呼喚下，能否應聲而起，成為時代的導師。從這一角度思之，李亦園從凌純聲和陳奇祿身上看到的學術力，既是這兩位人類學院士的內在稟性，也是他們對時代的回應。以此反推，李亦園和凌純聲、陳奇祿分屬不同世代，所以李亦園當亦具備某些不見諸於凌純聲和陳奇祿、但卻是李亦園回應自身所處之時代的學術力。那麼這一學術力為何？它對臺灣人類學界的影響又為何？

許倬雲在《懷念李亦園院士》的紀念文集中寫道（2017：24）：「李亦園的個性，沉穩而有條理。是一個主持單位的大將之才。他一輩子的事業，前半段是襄助前輩們的工作，安定內部。後半段，他卻自己開闢天地，一方面將中研院的民族學研究所，發展為這一學門的重點單位。接著則是開創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學院」。「襄助」也意味著「尊師重道」與「傳承」。如果參照李亦園的《大事記》，「尊師傳薪」確可視之為李亦園的第五個學術力。

李亦園第一本專著以《文化與行為》（1966a）為名，乃因緣於哈佛大學業師Kluckhohn之著述*Culture and Behavior*（1962）。李亦園返台不久，Kluckhohn即辭世（1905-1960）。李亦園便是以借用書名的方式，來感念英年早逝的恩師（黃克武訪問 2005：78）。

1984年，李亦園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五屆院士。記者問他，當選院士後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麼？李亦園回答：到李濟和凌純聲的墓前「謝師」，因為：「學術的淵源來自老師」（n.d.：56）。

「謝師」情懷在《大事記》中不時流露。李亦園一生共獲頒五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包括法國巴黎梭邦（Sorbonne）大學（2001）、澳洲Griffith大學（2001）、國立清華大學（2004）、香港中文大學（2005）、國立臺灣大學（2008），其中，尤以巴黎梭邦和清大對他意義最為不凡。巴黎大學梭邦校區正是李亦園恩師凌純聲取得博士學位之處，在一篇詩作中，李亦園（n.d.：199）便寫下「梭邦榮銜慰師恩」的感懷。至於清大，不僅因為他在該校創建了臺灣第一個結合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綜合院所，實踐他科際合作的理念，更因清大的人社院上承北平清華大學在民國14年所設立的「國學研究院」，而李亦園的恩師李濟就是國學院教員，李亦園（n.d.：16）寫道：「去清華實有延續薪傳之意」。

吳燕和對於李亦園的尊師，特別有感受。2008年，吳燕和在闊別10年後終於有機會返台。一到臺灣，李亦園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三張犁山上拜祭凌純聲。吳燕和是凌純聲聘用進入民族所，並在凌純聲的鼓勵下，報考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終而造就他的人類學生涯，也所以李亦園要帶他去掃墓謝師。吳燕和（2017：49）說：此舉讓我「極為感動」，「親身體驗到李先生不忘師恩的典範」。

李亦園的學術生涯當然並非完美無瑕。1998年從中研院民族所的學術崗位榮退，在接受媒體訪談時，他坦承：「我最大的缺點，或說是開創者的性格，[就是]做一部份就跳到另一部份，領導或參與不同的研究」；再者，「我也沒有在人類學上創造高深的理論或哲學式的理論架構」（李彥甫 1997）。的確，李亦園的心理人類學、華僑研究，和臺灣土著民族的綜合研究，在「1980年代以後就未再繼續」；媽祖進香的研究議題，雖有首倡之功，但也「未完整的發

揮」（黃克武訪問 2005：90）。或許，這是因為李亦園自1984年起即陸續出任清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執行長、董事長等行政職務，乃至無暇顧及研究。

李亦園對於自身的人類學生涯固然有他的反思，但學界也有他們的觀察和評述。有不少人在肯定李亦園的貢獻之餘，也不免有所「微詞」，特別是李亦園「重用子弟兵」的行事風格。有人甚至感嘆：如果李亦園多能師承凌純聲寬博的氣度，臺灣人類學界今日或許不會如此飽受「派系」干擾！當然，也有人為其辯白：李亦園隻身從閩南赴台求學，幸賴凌純聲、李濟等幾位恩師提攜，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與機運，終得闖出一方人類學天地，他的重用子弟兵，或許僅是效法恩師提攜後輩子弟的做法而已，不必然關乎派系！

每一位人類學者都各有其性格、才情和時代性，李亦園也不例外。對今人而言，追撫往昔，無外乎鑒往知來。若前人有所失，則引為殷鑑；有所建樹，則引為鵠的，以此自勉。所當自勉者，不在效行前人行止之表相，而在效行前人回應時代的智慧與熱情：亦即，以「應時之師」自我期許，在傳遞文化知識與人類學尊重他者的觀點之餘，更要能走出時代的框囿，各以所長，打開學術新局。本文將李亦園的人類學生涯放置在他所身處的時代，彼此對話，就是希望從中，既能照見臺灣早期人類學者的學術情懷和學術作為，更照見時代的契機，乃至學術情懷和學術作為背後的魄力與堅持。

參考書目

王崧興

- 1967 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 [Kwei-Shan Tao: A Study of a Chinese Fishing Community in Formosa]。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91 臺灣漢人社會研究的反思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Taiwan Han Society]。台大考古人類學刊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7:1-11。

王嵩山

- 1981 略談中國民族學研究取向與臺灣漢人社會研究：Dr. Gallin 訪問紀實 [A Brief Talk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Chinese Ethnology and the

Study of Taiwan Han Society: Interview with Dr. Gallin]. 人類與文化 [Human and Culture] (15):144-151。

尹建中

- 1996 民族學[Ethnology]。刊於[In]中華民國學術志 [The Academia Gazette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頁375-415 [pp. 375-415]。台北：國史館中華民國學術志編纂委員會 [Taipei: Gazetteer of Republic of China Compilation Committee, Academia Historica]。

朱敬一

- 2003 我們在努力彌補當年的遺憾 [We Are Working Hard to Remedy Our Regrets of the Early Days]。刊於[In]說文化，談宗教——人類學的觀點 [Speaking of Culture and Religion—Anthropological Points of View], 頁5-8 [pp. 5-8]。台北：臺灣大學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任先民

- 2012 中央研究院與我的臺灣原住民研究 [Academia Sinica and My Study of Taiwan Aborigines]。發現（史前館電子報）[Discovery (digital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第236期 [no. 236]。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beta.nmp.gov.tw/enews/no236/page_01.html, 2018年8月30日 [August 30, 2018]。

余舜德、張珣、劉斐玟 主編

- 2018 人類學家的我們、你們、他們 [Let's Go Anthropology]。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何聯奎

- 1960 蔡子民先生對於民族學之貢獻 [Mr. Cai, Juemin's Contribution to Ethnology]。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9:1-49。

何翠萍

- 1999 從中國少數民族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 [From the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Minoritie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s"]。刊於[In]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Retrospect & Prospect], 徐正光、黃應貴主編 [Cheng-kuang Hsu and Ying-Kuei Huang, eds.], 頁357-404 [pp. 357-40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李子寧 編

- 2017 李亦園自書生平紀事 [Li, Yih-yuan's Recording of His Life Experiences]。刊於[In]懷念李亦園院士 [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Li, Yih-yuan], 頁238-263 [pp. 238-263]。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李亦園 主編

- 1963、1964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調查與研究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上、下兩冊 [two volumes]。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74 文化人類學選讀 [Reading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台北：食貨出版社 [Taipei: Shih-Huo Publishing Company]。
- 1983 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 [An Evaluation Report and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on Aborigines]。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委託研究計畫 [A Research Commissioned by Department of Civic Affairs of Taiwan Province]。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執行 [Executed by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李亦園

- 1960a 北呂宋伊富高族的宗教結構 [The Structure of the Ifugao Religion]。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9:399-409。
- 1960b 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Anito: A Study of the Malevolent Spirits of the Yami]。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0:41-55。
- 1962a 總說 [Summary]。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 頁1-14 [pp. 1-1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62b 祖靈的底蘊：南澳泰雅族人超自然信仰研究 [The Supernatural Concepts and Ritual Behaviors of the Nan-ao Atayal]。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4:1-46。
- 1962c 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 [Two Socio-Religion Structures of Taiwan Aborigines]。刊於[In]亞洲史學會議第二屆會議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nnual Meetings of History in Asia], 頁241-252 [pp.241-252]。台北：亞洲歷史學家編輯委員會 [Taipei: Asian Historians Editorial Committee]。
- 1963a 序 [Preface]。刊於[In]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調查與研究，上冊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v. 1], 頁1-2 [pp. 1-2]。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63b 南澳泰雅族的神話傳說 [Myths and Legends of the Nan-ao Atayal]。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5:97-135。

- 1965a 馬來亞華人社會的社團組織與領袖結構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Leadership Structure in a Malayan Town]。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45。
- 1965b 東南亞諸國現代化的若干問題 [Several Issu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思與言 [Thought and Words] 3(4):3-11。
- 1966a 文化與行為 [Culture and Behavior]。台北：商務出版社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66b 東南亞華僑的本土化運動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ern Asia]。思與言 [Thought and Words] 3(6):34-38。
- 1967 我怎樣做華僑社會的實地研究 [How I Conduct Fieldwork Research in Oversea Chinese Societies]。東方雜誌 [Oriental Magazine] 1(1): 59-67。
- 1968 馬來亞華人社會領袖之研究 [Study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Oversea Chinese Society in Malaya]。東亞學會年報 [Annal of East Asia Association] 7:1-47。
- 1970a 凌純聲先生對中國民族學之貢獻 [Mr. Ling, Shun-sheng'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Ethnology]。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9:1-10。
- 1970b 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 [An Immigrant Town: Lif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rn Malaya]。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71a 十六年來的民族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thnology 1955-1971: Retrospect and Prospect]。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1:1-15。
- 1971b 區域研究與科際合作 [Area Stud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美國研究 [American Studies] 2(3):231-290。
- 1972a 序言 [Preface]。刊於[In]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 [Symposium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李亦園、楊國樞主編 [Li, Yih-yuan, and Guo-shu Yang, eds.]，頁i-iv [pp. i-iv]。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72b 從若干儀式行為看中國國民性的一面 [Aspect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s Viewed from Some Ritual Behaviors]。刊於[In]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 [Symposium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李亦園、楊國樞主編 [Li, Yih-yuan and Guo-shu Yang, eds.]，頁175-199 [pp. 175-19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72c 二十年來我國行為科學的發展與展望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Behavioral Sciences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20 Years]。思與言 [Thought

- and Words] 10(4):7-10。
- 1974 序 [Preface]。刊於[In]文化人類學選讀 [Reading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頁3 [p. 3]。台北：食貨出版社 [Taipei: Shih-Huo Publishing House]。
- 1975a 凌純聲先生與中國民族學 [Mr. Ling, Shun-sheng and Chinese Ethnology]。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Chinese Cultural Revival Monthly] 8(2):17-23。
- 1975b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Society]。台北：牧童出版社 [Taipei: Mutong Publishing House]。
- 1976 文化比較研究法探究 [Exploration into the Method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思與言 [Thought and Words] 13(5):1-13。
- 1978a 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芮逸夫教授的學術成就與貢獻 [Chinese Ethnicities, Society, and Culture: Professor Ruey, Yih-fu'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食貨月刊 [Shih-Huo Monthly] 11(7):295-324。
- 1978b 自然觀察研究 [Natural Observation Study]。刊於[In]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楊國樞等合編 [Yang, Guo-shu, et al., eds.], 頁131-158 [pp. 131-158]。台北：東華書局 [Taipei: Tung Hua Book Co., Ltd.]。
- 1979 信仰與文化 [Belief and Culture]。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Taipei: Chuliu Book Co., Ltd.]。
- 1982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aiwan Aboriginal Peoples]。台北：聯經出版社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1983a 悼念李濟之先生 [In Tribute to Mr. Li, Chi]。刊於[In]師徒、神話及其他 [Teacher and Apprentice, Myth, and Other Essays], 頁9-14 [pp. 9-14]。台北：正中書局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 1983b 師徒、神話及其他 [Teacher and Apprentice, Myth, and Other Essays]。台北：正中書局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 1984 社會變遷與宗教皈依：一個象徵人類學理論模型的建立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Movement: A Symbolic Anthropological View]。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6:1-28。
- 1988 和諧與均衡——民間信仰中的宇宙詮釋與心靈慰藉模型 [Harmony and Balance—The Cosm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piritual Comforting Model in Folk Beliefs]。刊於[In]現代人心靈的真空及補償：馬禮遜入華宣教180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一 [The Vacuum and Remedy of Modern Men's Spiritual World: Symposium in Honor of the 18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 Morrison's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林治平主編 [Lin, Chih-ping, ed.], 頁5-24 [pp. 5-24]。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Taipei: Cosmiccare]。
- 1991 臺灣民間宗教的現代趨勢——對彼得伯格教授東亞發展文化因素論的回應 [The Current Tendencies of Taiwan Folk Religions—Response to

- Prof. Peter Burger's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刊於[In]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下冊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Mr. Kao, Chu-hsun's 80th Birthday, v. 2]。宋文薰等編 [Sung, Wen-hsun, et al., eds.], 頁23-35 [pp. 23-35]。台北市：正中書局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 1992 文化的圖像 [Images of Culture], 上、下兩冊 [two volumes]。台北：允晨出版公司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 1993a 民族誌學與社會人類學——從臺灣人類學研究談到我國人類學發展的若干趨勢 [From Ethnography to Social Anthropology: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Taiwan]。清華學報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3(4):341-360。
- 1993b 從民間文化看文化中國 [To View Cultural China from Folk Culture]。台大考古人類學刊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9:7-17。
- 1995a 四十年來的民族學研究所：一個全程參與者的回顧與反思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of One Who Was at the Beginning]。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80:3-13。
- 1995b 感情的機緣 [The Serendipity of Affection]。聯合報 [United Daily], 37版 [p. 37], 2月8日 [February 8]。
- 1996a 文化與修養 [Culture and Cultivation]。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編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d.]。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Taipei: Youth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 1996b 人類的視野 [The Visions of Human]。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1998a 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 [Ms. Ling, Shun-sheng's Ethnology]。刊於[In]新學術之路——史語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 [Along New Pathways of Resea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 [Tu, Cheng-sheng and Fan-sen Wang, eds.], 頁737-745 [pp. 737-745]。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98b 徘徊在史語所門外 [Lingering around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刊於[In]新學術之路——史語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 [Along New Pathways of Resea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 [Tu, Cheng-sheng and Fan-sen Wang, eds.], 頁1027-1033 [pp. 1027-103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 Academia Sinica].
- 1999a 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 [Albums from the Field: An Anthropologist's Journey]. 新北市：立緒文化 [New Taipei City: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 1999b 民間寺廟的轉型與蛻變——新竹市民間信仰田野調查研究 [Th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Folk Temples—The Field Research of Folk Beliefs in Xinzhu City]. 刊於[In]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 [Albums from the Field: An Anthropologist's Journey], 頁310-345 [pp. 310-345]. 新北市：立緒文化 [New Taipei City: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 2000 和諧與超越的身體實踐——中國傳統氣與內在修練文化的個人觀察 [Bodily Practice of Harmony and Transcendence -- Personal Observation of Qi and the Culture of Internal Cultiva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 刊於[In]氣的文化研究：文化、氣與傳統醫學學術研討會 [Symposium on The Culture of Qi: Culture, Qi,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頁1-27 [pp. 1-27].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02a 李亦園自選集 [Li, Yih-yuan's Self-Selected Anthology].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2002b 來自碧落與黃泉 [From the Realm of Heaven and the Underworld]. 聯合報[United Daily], 39版[p. 39], 7月2日[July 2].
- 2003a 陳奇祿院士的學術貢獻與書畫藝術 [Academician Chen, Chi-lu's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Hi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刊於[In] 陳奇祿書畫集 [Anthology of Chen, Chi-lu'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陳奇祿著 [Chen, Chi-lu], 頁10-14 [pp. 10-14]. 滬汪人薪傳文化基金會印行 [Ouwangren Heritage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 2003b 說文化，談宗教——人類學的觀點 [Speaking of Culture and Religion—Anthropological Points of View]. 台北：臺灣大學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 n.d. 《大事記》 [Journal of Major Events].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典藏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李亦園、楊國樞 主編
- 1972 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 [Symposium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李亦園等
- 1975 高山族研究回顧與前瞻座談會綜合討論紀錄 [Final Discussions].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40: 107-117.
- 1983 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Report on Mountain Area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李彥甫

- 1998 李亦園：研究台應具世界觀 [Li, Yih-yuan: Taiwan's Research Should Have a Global Perspective]。聯合報 [United Daily], 14版, 7月13日 [July 13]。

李康齡

- 1998 我的人類學家爸爸--李亦園院士 [My Anthropologist Father -- Academician Li, Yih-yuan]。聯合報 [United Daily], 37版 [p. 37], 12月20日 [December 20]。

吳燕和

- 1963 社化過程——泰雅人的養成 [Socialization Process: Becoming an Atayal]。刊於[In]南澳的泰雅人, 上冊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v. 1], 頁51-107 [pp. 51-10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06 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 [Home Village, Field, and Train: An Anthropologist's Trilogy]。台北：時報文化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 2017 紅燒豬腳：亦園師的田野拿手好菜 [Braised Pork Feet: Teacher Yih-yuan's Best Dish]。刊於[In]懷念李亦園院士 [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Li, Yih-yuan], 頁48-49 [pp. 48-4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岳南

- 2011 南渡北歸 [Southbound, Northbound]。台北：時報文化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岡田謙

- 1960 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 [Religious Sphere of Northern Taiwan Villages], 陳乃藥譯。台北文物 [Taipei Culture and Materials] 9(4): 14-29。

林金梅 編

- 2003 陳奇祿書畫集 [Collection of Chen Chi-lu'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Executive Minist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mittee]。

施振民

- 1973 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 [Religious Sphe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xplanatory Model on the Settlement of Changhua Plain]。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6: 191-208。

凌純聲

- 1934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The Goldi Tribe o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上、下兩冊 [2 volumes]。南京：國立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

[Nank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唐美君

- 1976 人類學在中國 [Anthropology in China]。人類與文化 [Human and Culture] 7: 9。

徐正光

- 2017 回憶和李先生學習的日子 [Reminiscence of Those Days Studying from Mr. Li]。刊於[In]懷念李亦園院士 [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Li, Yih-yuan], 頁61-67 [pp. 61-6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許倬雲

- 2017 情誼同手足，風義如金石 [Friendship as Brothers, Righteousness as Gold and Stone]。刊於[In]懷念李亦園院士 [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Li, Yih-yuan], 頁22-24 [pp. 22-2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許嘉明

- 1973 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of Hoklorized Hakka in the Changhua Plain]。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6: 165-190。

陳奇祿

- 1951 臺灣土著長盾和東南亞各地長盾的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ong Shields of Taiwan Aborigines and Southeastern Asia]。文史哲學報 [NTU Humanitas Taiwanica] 2: 215-296。

陳奇祿 口述，陳怡真 撰

- 2004 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 [Reminiscences of Dr. Chen, Chi-lu]。新北：國史館 [New Taipei City: Academia Historica]。

陳其南

- 1975 光復後高山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 [Reviews of Post-War Social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Taiwan Aborigines]。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40: 19-49。
- 1980 清代臺灣社會的結構變遷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Taiwan during the Ch'ing Period]。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49: 115-147。

陳茂泰

- 1973 從旱田到果園：道澤與卡母界農業經濟變遷的調適 [From Swidden to Orchard: Tautsa and Kamujiau's Adjustment to Agricultural Change]。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6: 11-33。

陳紹馨

- 1966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 [Taiwan as a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2: 9-14。
- 陳紹馨、李亦園
- 1968 外國學者的臺灣社會文化研究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Taiwan Society and Culture]。中國民族學通訊 [Newsletter of Chinese ethnology] 8: 8-16。
- 陳懷曄
- 1996 學術也可以是一種信仰——訪李亦園院士 [Academia Can Also Be a Form of Belief: An Interview with Academician Li, Yih-yuan]。聯合報 [United Daily], 43版 [P. 43], 7月8日 [July 8]。
- 張光直
- 1969 凌著：美國東南與中國華東的丘墩文化序 [Forward to The Mound Cultures of East China and of Southeastern North America]。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7: 165-173。
- 張珣
- 1996 光復後臺灣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之回顧 [A Review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Han Chinese Religion in Taiwan, 1945-1995]。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81: 163-215。
- 1999 信仰與文化：李亦園先生與臺灣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 [Belief and Culture: Prof. Li, Yih-yuan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in Taiwan]。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88: 1-34。
- 張珣訪問
- 2005 民族所五十週年系列專訪——李亦園院士 [The Interview Series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ian Li, Yih-yuan]。民族所博物館影音資料庫 [Taipei: Audio-Visual Database of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黃克武訪問，潘彥蓉紀錄
- 2005 李亦園先生訪問記錄 [Mr. Li, Yih-yuan's Interviewing Records]。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黃樹民
- 1999 傳統主義、反傳統主義與臺灣人類學的發展 [Traditionalism, Anti-traditio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thropology]。刊於[In] 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徐正光、黃應貴主編 [Hsu, Cheng-kuang, Ying-kuei Huang, eds.], 頁197-209 [pp. 197-20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11 人類學與民族學百年學術發展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over the Past 100 Years]。刊於[In]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上）[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cademic Development, volume 1]。王汎森主編 [Wang, Fansen, ed.], 頁173-197 [pp. 173-19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聯經出版公司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黃應貴

- 1973 經濟適應與發展：一個臺灣中部高山族聚落的研究 [Economic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boriginal Settlement in Central Taiwan]。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6: 35-55。
- 1983 光復後臺灣地區人類學研究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ical Study in Taiwan, 1945-1982]。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5: 105-146。
- 1984 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 [Two Types of Social System among Taiwan Aborigines and Its Implications]。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7: 1-30。
- 1998 人類學與臺灣社會 [Anthropology and Taiwan Society]。新亞學術集刊 [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 16: 287-342。
- 1999 戰後臺灣人類學對於臺灣南島民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Taiwan Austronesia Peoples in Post-War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刊於[In]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回顧與前瞻篇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徐正光、黃應貴主編 [Hsu, Cheng-kuang & Ying-kuei Huang, eds.], 頁59-90 [pp. 59-90]。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楊福發

- 1964 個人生命史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 Eight Biographies]。刊於[In]南澳的泰雅人，下冊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v. 2], 頁597-680 [pp. 597-680]。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瑞岩民族學初步調查報告

- 1950 文獻專刊第二種 [Special Issue of Archives and Materials, No 2]。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pei: Archives and Material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莊英章

- 1995 漢人社會研究的若干省思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Han

- Societies]。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80: 27-36。
- 2005 歷史人類學與華南區域研究——若干理論範式的建構與思考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Hua'n'an Area Study—Construction and Contemplation of Some Theoretical Paradigms]。歷史人類學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3(1): 155-169。
- 2017 追念亦園師：幾則瑣事回想 [In Remembrance of Teacher Yih-yuan: A few Memories。刊於[In]懷念李亦園院士 [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Li, Yih-yuan], 頁54-57 [pp. 54-5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潘光哲 訪問
- 2003 《思與言》參與創刊者口述歷史：李亦園先生訪問記錄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Founders of Thought and Words: Interview with Mr. Li, Yih-yuan]。思與言 [Thought and Words] 41(3): 195-214。
- 劉斌雄
- 1995 臺灣的田野是無盡的寶藏 [Taiwan Fieldwork Is an Inexhaustible Treasure]。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80: 19-26。
- 鄭美能
- 1974 農業政策與臺灣農村社會經濟變遷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of Rural Society in Taiwan]。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7: 113-143。
- 瞿海源
- 2017 記李先生與我 [A Note on Mr. Li and Me]。刊於[In]懷念李亦園院士[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Li, Yih-yuan], 頁58-60 [pp. 58-60]。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瞿海源等
- 2020 探索科際對話的新視域 [Explor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Horizons]。刊於[In]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 [Empathy, Affect, and Intersubjectivity: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in Dialogue], 增訂版 [Extended Edition], 劉斐玟、朱瑞玲主編 [Liu, Fei-wen and Cathy Chu, eds.], 頁432-466 [pp. 432-46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蕭雪球
- 2000 文化震撼的體悟：李亦園談《田野圖像》 [Reflections on Culture Shock: Li, Yih-yuan Speaks on Albums from the Field]。中央日報 [Central Daily News], 21版 [p. 21], 1月25日 [January 25]。
- 舊唐書
- 1981 劉昫 (887-946) 撰 [Written by Liu, Xu (887-946)]。台北：臺灣中華書

局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Bauman, Richard

1977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90 *Poetics and Performance a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 59-88.

Benedict, Ruth

1934 *Patterns of Culture*.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erger, Peter

1988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Hsiao, eds. Pp. 3-11.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Crissman, Lawrence

1972 *Marketing on the Changhua Plain, Taiwan.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E. W. Willmott ed. Pp. 215-2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ubois, Cora

1944 *The People of Alor: A Social-Psychological Study of an East Indian Island*.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eedman, 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9 *Why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9: 5-13.

Fried, Morton

1970 *Clans and Lineages: How to Tell Them Apart and Why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Socie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29: 11-36.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Harris, Marvin

1976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mic/Etic Distinc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1): 329-350.

Kluckhohn, Clyde

1942 *Myths and Rituals: A General Theory*.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35: 45-79.

1945 *The Personal Document in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In 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Louis Gottschalk, Clyde Kluckhohn, and Robert Angell, eds. Pp. 79-173.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1 Value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in a Theory of Action. *In*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Shils, eds. Pp. 388-4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ulture and Behavior: Collected Essay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Li, Yih-yuan 李亦園

1968 Ghost Marriage, Shamanism and Kinship Behavior in a Rural Village in Taiwan. *In* Folk Religion and the Worldview in the Sothwestern Pacific. Tokyo: Kieo University.

1972 Chinese Shamanism in Taiwan—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Honolulu.

1976 Chinese Geomancy and Ancestor Worship. *In* Ancestors. William Newell, ed. Pp. 329-338. Boston: De Gruyter, Inc.

1985 Social Change,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Personality Adjustment: An Anthropological View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Wen-shing Tseng and David Wu, eds. Pp. 57-6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inton, Robert, and A. Irving Hallowell

1943 Nativistic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5(2): 230-240.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1948 Magic, Science,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Merton, Robert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672-682.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1951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Ochs, Elinor

2022 Thinking in Between Disciplin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1: 1-15.

Pike, Kenneth

1967 Etic and Emic Standpoint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Behavior. *In*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Pp. 37-72. The Hague: Mouton.

Radcliffe-Brown, Alfred

- 1939 Taboo. The Frazer Le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40 On Social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0(1): 1-12.
- 1958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 Selected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hlins, Marshall
- 1963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 285-303.
- Skinner, William
- 1964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3-43.
- 1965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2): 195-228.
- Spiro, Melford, and R.G. D'anarade
- 1958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ome Supernatural Belief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0: 456-466.
- Tylor, Edward
- 1994 [1871]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劉斐玟

115201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fwliu@gate.sinica.edu.tw

Li, Yih-yuan and Taiwanese Anthropology (1950s-1980s):

The Dialogicality between Academia and Its Times

Fei-wen Liu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cademician Li, Yih-yuan (1931-2017) wa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nthropologists trained in Taiwan. The many roles he played in research, teaching,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and being a public intellectual speak to his passion for anthropology, and hi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in Taiwan. This article uses Li, Yih-yuan's career to explore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anthropology, focusing on the period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Given that anthropolog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local knowledge," or "the emic standpoint," this article also seeks to reconstruct Li's own perspectives on the aspirations of an anthropologist, shedding light on his career and contribution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ree genres of Li's writings: (1)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publications, oral histories, and media interviews, (2) unpublished journals, especially his "Journal of Major Events" (*dashi ji*), and (3) his commentaries on two esteemed Taiwanese anthropologists, Ling, Shun-sheng (1900-1981) and Chen, Chi-lu (1923-2014). The third genre is particularly insightful, as Li's reflections on these two scholars reveal not only "what is seen" but also the "perspectives taken." Li's portrayal of these distinguished figures provides a lens through which he articulated his vision of an ideal anthropologist. Moreover, since Ling and Chen belonged to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an Li, his commentaries also reflect the dialogical nature of academic evolution—how Li viewed these scholars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time and how he engaged with the academic landscape of his own era. By emphasizing this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Li's perspectives on these academician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is anthropology care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anthropology before the mid-1980s—a period after which his administrative duties took precedence over research.

Through Li's perspectives, four key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emerge: (1) pioneering work, (2) broad vision, (3) leadership, and (4)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anthropology. As a pioneer, Li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anthropologist to focus on cultural change and introduc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especially functionalism, culture-and-personality theories) into his analyses in the early 1960s. At that time, mos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Taiwan was "salvage anthropology" documenting the disappearing tradi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s, relying heavily on elder interviews and producing descriptive rather than analytical reports. Li also broke new ground as the first Taiwanese anthropologist to conduct fieldwork overseas, particularly in Southeast Asia, starting in 1962. His broad vision was evident in his leadership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which began in the 1960s and demonstrated his commitment to transcending ethnic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for cultural analysis. Li's leadership was further reflected in his efforts to mentor a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 focused on Han Chinese society,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folk religions. Thanks to his introduct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in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folk culture, these areas were finally recognized as serious academic subjects in the 1980s. Finally, Li was a prolific writer of popular essays for newspapers and semi-academic journals, introducing anthropology to the general public from the 1960s onward—an achievement unmatched by any other anthropologist in Taiwan, even today.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also highlights another of Li's scholarly virtues that extends beyond his commentaries on his predecessors: his deep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his care for students, which exemplifies his dedication to honoring and advancing the scholarly tradition he cherished.

An individual's scholarly vision is inevitably shaped by th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re nurtured. Th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illuminate not only Li, Yih-yuan's characteristics and career as an anthropologist but also his interactions wi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his time. It is through this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a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aiwanese anthropology.

Keywords: Taiwan anthropologist, Yih-yuan Li, history of Taiwan anthropology, ethnology, emic

